

十九世紀初牛痘的在地化—— 以《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 《西洋種痘論》與《引痘略》為討論中心

張嘉鳳*

藉由介紹、分析與比較《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1805)、《西洋種痘論》(1815)與《引痘略》(1817)的作者、版本、流通概況、書寫策略與內容，本文嘗試重建十九世紀啖咕喇國種痘新法傳入中國初期的歷史，並檢視該法傳華之後的關鍵發展與變化。

《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是啖咕喇國醫師皮爾遜 (Alexander Pearson) 所作，翻譯成中文在華發行，是第一本以中文介紹西洋種痘新法的文本；黃安懷寫作《西洋種痘論》，首倡以在地觀點觀看與詮釋西法；《引痘略》則出於中國種痘師邱熺之手，是十九世紀中國最流行的西法讀本。這三部書籍發行量的多寡與流通地域的廣狹，不僅是它們受歡迎與否的見證，同時也顯示當時中國人對他們不同的接受程度。三位作者的書寫形式、策略與內容，對讀者所造成不一的影響，其中尤以《引痘略》對西洋種痘法的重新定位與詮釋，最能左右與反映十九世紀中國人對西方醫學技術及其理論的典型理解。

本文透過比較與分析歐洲與中國作者如何介紹和表述西洋種痘新法，與中國作者如何理解和轉化西洋種痘法的理論與技術，以及將之在地化的思維、策略與目的，凸顯清末中國人學習與觀看西學的複雜目光，以及他們對待西方醫療技術與文化的多元態度，並藉此呈現十九世紀中西醫學技術與文化交流的實況。

關鍵詞：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 西洋種痘論 引痘略 牛痘 種痘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一・前言

十九世紀初，英國醫生咕嚕 (Edward Jenner, 1749-1823) 發明的種痘術成功地傳入中國。¹ 自此以後，在商人、鄉紳、官吏、中外種痘師、醫生與傳教士的共同經營與努力之下，由南徂北漸次展開一場歷時頗久的推廣活動。這項西洋種法不但提供防治天花的另一項新選擇，並對舊有的鼻苗種痘法產生衝擊，同時也影響當時即將面臨空前變局的中國社會，漸為江南育嬰慈善事業的重心之一。英國種痘術在短時間內被接受的事實，表現當時部分中國人對西方醫療技術的友善態度。

過去學者對西洋種痘術初傳入華及其傳播概況已有論述與貢獻，尤其是對傳播路線與過程的介紹最多。² 本文則試圖從新的角度出發，以十九世紀初年出版

¹ 十九世紀，英國 Edward Jenner 醫師在中國之譯名有「咕嚕」、「咕嚕」、「咕哪」、「咕拿」與「直納爾」等；參見英·哆咻咬編輯，皮爾遜審訂，嘶嚕唛譯，清·鄭崇謙書，《啖咕唛國新出種痘奇書》（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圖書館藏本），頁2-3；查道倫，《引痘集要》（1869，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卷上，頁1；沈善豐，《牛痘新編》（1885，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卷上，頁1；劉堃重刊，《引種牛痘方書》（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咸豐五年〔1855〕孟夏月重刊，板存江西省甲戌坊蔡照堂刻字店），頁52；楊家茂，〈牛痘初傳我國史略及其意義〉，《中華醫史雜誌》20.2 (1990): 84。日本廣瀨元恭則是將之譯為「應涅兒」；見日·廣瀨元恭校，《新訂牛痘奇法》（大阪：杏雨書屋藏嘉永二年〔1849〕仲冬刻本，時習堂藏本），頁1。

² 前賢對牛痘傳華過程與傳播路線的介紹與討論甚多，其中較重要的成果，參見陳垣，〈牛痘入中國考略〉（1908-1909），氏著，《陳垣早年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頁217-224；Chimin Wong and Lien-Teh Wu（王吉民、伍連德），*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1932; repr., Taipei: 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 1985), pp. 273-301；彭澤益，〈西洋種痘法初傳中國考〉，《科學》32.7 (1950): 203-208；夏鼐，〈西洋種痘法初傳中國補考〉，《科學》32.11 (1950): 343-344（筆者感謝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孫承晟先生提供以上兩篇論文）；范行準，《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3），頁134-137；梁其姿，〈明清預防天花措施之演變〉，《國史釋論》（臺北：食貨出版社，1987），上冊，頁249-252；廖育群，〈牛痘法在近代中國的傳播〉，《中國科技史料》9.2 (1988): 36-38；楊家茂，〈牛痘初傳我國史略及其意義〉，頁85；廖育群，《岐黃醫道》（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頁228-230；彭澤益，〈廣州洋貨十三行商倡導對外洋牛痘法及荷蘭豆的引進與傳播〉，《九州學刊》4.1 (1991): 73-83；馬伯英、高晞、洪中立，《中外醫學文化交流史——中外醫學跨文化傳通》（上海：文匯出版社，1993），頁318；Angela Ki Che Leung（梁其姿），

的中文西洋種痘文獻——《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1805)、《西洋種痘論》(1815)與《引痘略》(1817)——為中心，透過釐清其作者、版本和流通概況，以及針對其內容進行介紹、解讀、分析與比較，探索此一技術傳華初期的樣貌，並檢視西洋種痘新法傳華之後發展與變化的關鍵。

在比對和分析文獻的同時，本文亦將觀察歐洲醫生與中國種痘師如何介紹和表述西洋種痘新法，並探究中國種痘師如何理解與轉化西洋種痘法的理論、技術和臨床實踐，以及將之在地化的思維、方針與策略，及其動機、目的與意義，以瞭解清末中國人學習與觀看西學的複雜目光，以及他們對待西方醫療技術與文化的多元態度，藉此重建清末中西醫學技術與文化交流的實況。

二・《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西洋種痘論》與《引痘略》之作者、出版和流通概況

根據英國大英圖書館（The British Library，或譯為不列顛圖書館）典藏的文獻，一八〇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一封寄自廣東的信件，提到中國行商建議英國人將有益的事物介紹進中國，使中國人對英國心生好感。不久之後，印度孟買醫局（Bombay Medical Board）派遣英國東印度公司醫生將牛痘疫苗運抵中國，³ 並在行商的協助之下，尋找幾位健康的兒童接種疫苗，包括行商 Chunqua 兄弟 Cheequa 的女兒，但因疫苗過時而失效，此舉遂宣告失敗。⁴ Chunqua 就是經營

“‘Variolation’ and Vacc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 1570-1911,” in *Vaccinia, Vaccination and Vaccinology: Jenner, Pasteur and Their Successors*, ed. S. Plotkin and B. Fantini (Paris: Elsevier, 1996), pp. 67-71；黃啟臣，〈人痘的西傳與牛痘的東漸〉，《海交史研究》1999.1：37-40；董少新，〈十九世紀前期西醫在廣州口岸的傳播〉，《海交史研究》2002.2：22-23；余新忠，〈清代江南種痘事業探論〉，《清史研究》2003.2：31-34；董少新，〈論邱煊與牛痘在華之傳播〉，《廣東社會科學》2007.1：134-140。

³ 一八〇二年，英國種痘法傳入其殖民地印度，印度普遍接受此一新法的過程頗為緩慢而曲折，相關研究參見 David Arnold, *Colonizing the Body: State Medicine and Epidemic Disease in Nineteenth-Century India*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133-158.

⁴ The British Library, IOR/F/4/169/2985, pp. 107-110. 然而，根據馬士與王吉民、伍連德的說法，孟買總督送出疫苗的時間是在一八〇三年八月八日，十月疫苗才抵達廣東，終因疫苗失效而失敗；參見美·馬士著，區宗華譯，林樹惠校，《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1926，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第1冊第1，2卷，頁716；Wong

東生行的劉德章，籍隸安徽，以章官 (Chunqua) 為商名。⁵ 根據上述紀錄，劉氏兄弟是首批協助英商引進該國新種痘法的中國商人。

一九三二年，王吉民與伍連德以英文撰寫《中國醫學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指出英國種痘法成功傳入澳門的經過眾說紛紜，其中以英國東印度公司駐澳門醫師皮爾遜 (Alexander Pearson, 1780-1874) 的說法最可信。⁶ 一八〇五年春天，葡萄牙商人 Pedro Hewit 透過希望號 (*Esperanza*) 商船從馬尼拉「裝載嬰兒」，透過輪流接種牛痘的方式，使疫苗得以有效地延續與傳遞，成功地將英國種痘術引進澳門，⁷ 皮爾遜等醫師即以此批疫苗為當地外籍住民與中國人接種，⁸ 後者主要是居住在擁擠之處的貧民階層。⁹ 一八〇五年九月，西班牙醫師 Francisco Xavier Balmis (1753-1819) 率團抵達澳門，協同當局進行種痘，五個月間一共為六百九十一人接種。¹⁰ Balmis 自稱是首位將新種痘法引入中國的醫

and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 276; P. 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 2, *A Nasologia em Macau*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5), p. 166; 董少新，〈十九世紀前期西醫在廣州口岸的傳播〉，頁22。

⁵ 東生行於乾隆五十九年 (1794) 建行，劉德章於道光五年 (1825) 病故，東生行行務由其子劉承需接任。道光九年 (1829)，東生行因經營不善而破產倒閉；參見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 (1937，臺中：東海大學，1960)，頁244-245；楊國楨，〈洋商與大班——廣東十三行文書初探〉，《近代史研究》1996.3：8。

⁶ Wong and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 277.

⁷ 稍後抵達澳門種痘的 Francisco Xavier Balmis 醫師也使用同樣的方法，以人傳人，此法在日後中國牛痘的傳播上亦頗常見；參見王惇甫，〈敘〉 (1863)；戴昌祚，〈序〉 (1882)，收入清·王惇甫 (新吾) 輯要，戴昌祚重訂，《引種牛痘新書》 (1863，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金聲堂藏本，光緒十四年 [1888] 京江劉氏重刊)，頁1-4。除了這種「攜數十童子奔走道路」的方法之外，十九世紀的中國痘師及牛痘支持者也採用乾苗法；參見曾望顏，〈序〉 (1828)，收入滋德堂施種牛痘局，《引痘條約合梓》 (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同治十三年 [1874] 鐫)，頁4。

⁸ 《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頁2；美·馬士著，區宗華譯，林樹惠校，《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 (1635-1834)》，第2冊第3卷，頁15；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 2, *A Nasologia em Macau*, pp. 164-169；董少新，〈十九世紀前期西醫在廣州口岸的傳播〉，頁22。

⁹ Wong and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 277.

¹⁰ Balmis 是西班牙國王卡洛斯四世 (Carlos IV) 的御醫，一八〇三年十一月銜命率團前往西班牙治下的美洲與菲律賓等殖民地傳播牛痘，該團攜帶二十二名兒童同行，以便傳遞與隨時取用疫苗。一八〇五年九月十日 Balmis 抵達澳門。根據伊莎貝爾·莫賴斯的研究，Balmis 抵達澳門之前，澳門判事官兼仁慈堂法官 Miguel de Arriaga 已經制定推廣牛痘的計畫，由議事會醫生兼軍醫 Domingos Gomes 負責，但因無自願者前來種痘，效果

師，¹¹ 皮爾遜聞訊駁斥其說，指出早在 Balmis 之前，皮爾遜本人與若干葡萄牙醫師已在澳門為人種痘。¹² 皮爾遜之說亦可徵諸於陳邦賢《中國醫學史》(1937)，陳氏徵引美國醫生柯為良 (Dr. Osgood) 的《醫館略述》：「嘉慶九年，英國公司沈醫官始來中國，往廣州經理醫事，寓澳門傳種牛痘」，¹³ 據范行準考證，《醫館略述》中提到的醫官譯名乃是「皮沈」，而「皮沈」就是皮爾遜。¹⁴ 此外，梁嘉彬在考證會隆行興衰時，引用一八四〇年七月十一日的《澳門新聞紙》(第五冊)，提到一八〇五年廣東省城啤啞醫生教人種痘，啤啞亦即皮爾遜。¹⁵

英國種痘法疫苗抵達澳門之際，皮爾遜隨即以英文撰寫一本小冊子，¹⁶ 爲了進一步推廣新法，並因應當地中國官員的檢證要求，皮爾遜委託嘶噹唻 (Sir

不彰，直到 Balmis 抵澳之後才出現轉機。在 Balmis 與 Gomes 的合作之下，澳門痘局自一八〇五年九月十六日起開始種痘。一八〇五年十月，Balmis 前往廣州兩個月，十一月三十日返回澳門。從一八〇五年九月到〇六年一月，澳門痘局在 Balmis 的協助下，一共為六百九十一人種痘。一八〇六年二月，Balmis 攜帶數百幅中國植物圖譜與十箱活植物，乘船離開澳門，一八〇六年九月返抵家門。參見伊莎貝爾·莫賴斯，〈種牛痘與澳門葡人〉，《廣東社會科學》2007.1：128-133。

¹¹ 十九世紀，除了皮爾遜與 Balmis 之外，尚有多位在華從事牛痘接種活動的外國人，包括英國傳教士維魏林 (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醫師合信氏 (Benjamin Hobson, 1816-1873)、美國美以美傳教士保靈 (Stephen Livingstone Baldwin, 1835-1902) 夫婦、美國長老會牧師嘉約翰 (John Glasgow Kerr, 1824-1901) 等。一八五九年，嘉約翰出版《種痘書》，介紹與推廣牛痘接種術；見楊家茂，〈牛痘初傳我國史略及其意義〉，頁83；田濤，〈清末民初在華基督教醫療衛生事業及其專業化〉，《近代史研究》1995.5：171；鄭澤清，〈昨天的抗爭——近代上海防疫掠影〉，《上海檔案》2003.4：52-53；賀璋蓉，〈十九世紀初至二十世紀初基督新教在廣州之發展〉，《世界宗教史研究》2001.2：109-110；李少明，〈建國前福建基督教的社會活動〉，《南平師專學報》1999.3：65；Wong and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p. 281, 286, 289.

¹²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 ed.,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May, 1833 (Canton, 1834), pp. 36-37; Wong and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 277.

¹³ 陳邦賢，《中國醫學史》(193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頁372。陳邦賢提到的嘉慶九年，經查該年十二月初一日對照西曆，已是西元一八〇五年一月一日，因此皮爾遜提到的西元一八〇五年春在澳門種痘之事，陳氏或將之換算為嘉慶九年。關於中西曆的對照，參見陳垣，《二十史朔閏表》(1925)，氏著，《陳援菴先生全集》(臺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93)，第14冊，頁1244。

¹⁴ 范行準，《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頁148。

¹⁵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頁251。

¹⁶ 此事記載於皮爾遜撰寫的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Board of the National Vaccine Establishment* (Canton, February 18, 1816)，轉引自 Wong and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 277.

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 將之譯成中文，書名定為《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圖一），「並由一位學習醫務的中國人幫助」之後刊行，¹⁷ 成為第一本以中文向中國人介紹與宣傳英國新種痘法的文本。《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最初發行二百冊，旋即告罄，隨後又再發行兩次，第三版加入 Balmis 遠征隊的文獻。¹⁸

《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或有《種痘奇書》、¹⁹《種痘奇法》、《牛痘奇法》、《泰西種痘奇書》之稱，范行準認為這些異名的出現，是因該書「在中國久已看不到之故，一般醫史學家的著作中，從未舉出它的原名，也不可能在外國文獻中找到它的原名」。²⁰ 如前所述，《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最初的發行量並非不廣，且目前亦未佚失，據筆者所見，除了英國牛津大學 (University of Oxford) 的重印本 (1858)²¹ 與衛爾康圖書館 (The Wellcome Library) 藏本²² 之外，英國大英圖書館、²³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¹⁷ 美·馬士著，區宗華譯，林樹惠校，《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 (1635-1834)》，第2冊第3卷，頁15。

¹⁸ Genevieve Miller ed., *Letters of Edward Jenner and Other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Early History of Vaccination*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25, n. 5.

¹⁹ 清·潘尚楫等修，鄧士憲等纂，《南海縣志》（Cambridge, MA: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道光十五年〔1835〕修，同治八年〔1869〕重刊），卷二五，〈藝文略〉，頁55；清·戴肇辰、蘇佩訓修，史澄、李光廷纂，《光緒廣州府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據清光緒五年〔1879〕刻本影印，2003），卷一六三，〈雜錄四〉，頁40。

²⁰ 范行準，《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頁147。

²¹ 一九三〇年代，向達在海外訪書時，曾在英國牛津大學見到一八五八年香港重刊之《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見向達，〈瀛涯瑣志〉，《問風月刊》8.12 (1936)，轉引自彭澤益，〈廣州洋貨十三行行商倡導對外洋牛痘法及荷蘭豆的引進與傳播〉，頁79。范行準《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也提及此版本，但僅說該書「末葉人名多改變」，未做任何深入的討論；見范行準，《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頁149。

²² 英國衛爾康圖書館所藏的《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線裝，七頁，末頁註明「嘉慶十年六月新刊」，封底貼有「From the Library of Dr. T. J. Pettigrew」字樣的標籤，此本似為重印本，但再版者不詳。衛爾康圖書館本封面雖題為《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但首頁卻題作〈新訂種痘奇法詳悉〉，這一點與亞非學院本、大英圖書館本、牛津大學本與耶魯大學本相同，〈新訂種痘奇法詳悉〉可能是《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最初訂定的書名。

²³ 夏鼎，〈西洋種痘法初傳中國補考〉，頁344；范行準，《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頁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與美國耶魯大學 (Yale University) 圖書館²⁴ 皆藏有原版，出版的時間都是嘉慶十年 (1805) 六月。

根據大英圖書館、亞非學院、耶魯大學、衛爾康圖書館與牛津大學典藏的《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嘉慶十年四月，「自小呂宋裝載嬰兒，傳此痘種到澳，本國醫生協同澳門醫生照法栽種」，²⁵ 以此與皮爾遜自述在疫苗傳入澳門時就已撰寫《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之說對照，²⁶ 則《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英文版撰成於嘉慶十年四月前後，而嘶噹唻將之譯成中文並出版的時間是六月。根據陳垣《二十史朔閏表》，嘉慶十年四月與六月，換算成西曆都在西元一八〇五年。²⁷ 但是，牛津大學重刊本卻將初版時間定為一八〇四年，此或因編者或出版者換算中西曆時不慎誤植所致。

亞非學院所藏的《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繪有「臂形」、「痘形」、「象牙小簪」與「外科小刀」四圖 (圖二)，耶魯大學藏本亦然，其痘形圖以紅色標示。但夏鼐與山崎哲郎所抄錄的大英圖書館本與衛爾康圖書館本雖亦標示出四圖，但「痘形」只存圖名與文字說明，不見圖像，²⁸ 范行準只轉錄大英圖書館本的文字部分，至於「臂形」、「象牙小簪」與「外科小刀」三圖，是根據朝鮮丁若鏞 (1762-1836)《與猶堂全書》本複製，²⁹ 而丁本則是轉錄自道光八年 (1828) 北京琉璃廠橋西路北奎光齋刻字鋪刊本。³⁰ 夏鼐、山崎哲郎與范行準所轉錄的文字部分，除了少數幾個字之外，均與亞非學院、耶魯大學藏本相同。

160-162；日・山崎哲郎，〈《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について〉，《日本の洋學論集》（東京：清文堂，1994），第2集，頁203-220（筆者感謝董少新先生提供此篇論文及中譯稿）。山崎哲郎指出大英圖書館珍藏兩部《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經過比對，與夏鼐、范行準所見之版本相同。

²⁴ 此一藏本上有皮爾遜之簽名，感謝梁其姿教授提供影本。關於此版本之討論，可參見張大慶，〈《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考〉，《中國科技史料》23.3 (2002)：209-213。

²⁵ 《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頁4。

²⁶ Alexander Pearson,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Board of the National Vaccine Establishment* (Canton, February 18, 1816)，轉引自 Wong and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 277.

²⁷ 陳垣，《二十史朔閏表》，頁1244。

²⁸ 山崎哲郎，〈《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について〉，頁214。

²⁹ 范行準，《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頁160-162。

³⁰ 朝鮮・丁若鏞著，金誠鎮編，鄭寅普、安在鴻校，《與猶堂全書》（Cambridge, MA: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哈佛燕京圖書館] 藏京城府：新朝鮮社，1939），第7集，頁23-26。

牛津大學皮藏《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重刻本書末題有：「一八八百五十八年本港憲諭重刻」字樣，³¹ 內容與大英博物館、亞非學院、耶魯大學藏本相同，但痘形圖只見文字而無圖。此一版本人名、國名多與原版不同，主要是去掉其原譯名之口字部首，例如將原版之「咕嚕」、「哆啞咬」、「噉啞」與「嘶啞啖」作「占拿」、「哆啞文」、「跛臣」和「斯當東」，而書首題名「啖咕喇國」，書末則作「英吉利國」或「英咕喇國」。

亞非學院圖書館典藏之《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僅七頁，線裝，包括圖與文兩部。³² 首頁繪有四圖：「臂形」、「痘形」、「象牙小簪」與「外科小刀」，分別繪出接種疫苗的部位與如何辨明真痘，以及種痘所需的工具，各圖皆有文字說明，提供讀者認明參考。至於內文部分，文首題有〈新訂種痘奇法詳悉〉字樣，此一標題與封面所題之書名不同。內文依次敘述天花危害之烈、英國醫生發現新種痘法的經過、新法在各洲的傳播概況、新法的效力、如何接種、認痘、取種以及如何辨別真痘和偽痘等。文末另附二行文字，比原文低一格，說明種痘之後的食物宜忌。最後則列出編輯者、撰寫修訂者、翻譯者與襄助出版者：

啖咕喇國公班衙命來廣統攝大班貿易事務哆啞咬敬輯

啖咕喇國公班衙命來廣醫學噉啞敬訂

啖咕喇國世襲男爵前乾隆五十八年隨本國使臣入京朝覲現理公班衙事務嘶啞啖繙譯

外洋會隆行商人鄭崇謙敬書

根據范行準考證，哆啞咬即 James Drummond，³³ 噉啞即皮爾遜。³⁴ 一八〇二到一八〇八年間，哆啞咬任職英國東印度公司特選委員會主席（大班），³⁵ 主持與中國人的貿易活動。³⁶ 根據咕嚕友人 Thomas Pruen 的說法，皮爾遜乃是應哆啞咬的要求而寫作《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³⁷

³¹ 感謝衣若蘭教授提供此一版本。

³² 本文以下的討論以亞非學院典藏之《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為根據。

³³ 彭澤益亦持相同意見；參見彭澤益，〈西洋種痘法初傳中國考〉，頁203。

³⁴ 范行準，〈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頁148-149。

³⁵ 光緒五年修纂的《光緒廣州府志》云：「乾隆年間，蕃商哆啞咬攜牛痘種至粵」；見《光緒廣州府志》卷一六三，〈雜錄四〉，頁40。由於英國醫生咕嚕發明種痘法的時間是嘉慶元年（1796），故痘種傳入廣東不可能是在乾隆年間。

³⁶ 楊國楨，〈洋商與大班〉，頁10-11。

³⁷ Miller ed., *Letters of Edward Jenner and Other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Early History of Vaccination*, p. 125, n. 4.

皮爾遜在華的活動細節不詳，《澳門新聞紙》第五冊（1840.07.11）追溯一八〇五年皮爾遜在廣東省城從事種痘與教學的事蹟，指出他在一年內接種兒童達數千人，並親自授徒種痘，他的學生也包括廣東本地人士，³⁸ 可見皮爾遜相當活躍並頗富聲名。一八一六至二九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付給醫生皮爾遜的年薪是一千三百鎊，有時還增加一千元的生活津貼。³⁹ 一八二五年，William C. Hunter 曾在廣州十三行東印度公司商館中見到皮爾遜。⁴⁰ 一八三二年秋，皮爾遜離華，廣東洋行種痘所中陳列其塑像以資紀念。一八四三年，澳門出版的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報告書中，公開讚揚皮爾遜種痘對人類的貢獻。⁴¹

將《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譯成中文⁴² 的嘶噹唻就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隨馬嘎爾尼（Lord Macartney）來華的副使嘶噹唻，⁴³ 他是該使節團唯一能以官話和乾隆皇帝對談的英國人，具備翻譯長才。一八〇六年八月，英國東印度公司曾將《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呈送給兩廣總督與戶部海關，盼得官方讚許，但

³⁸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頁251。

³⁹ 英國東印度公司發給員工薪資的方式之一，是按固定工資支付。一八一六年，由於兌換率不利的因素，在廣州以白銀支付，當年皮爾遜的薪資是一千三百鎊，合五千四百一十七元。《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多次記錄皮爾遜的薪資，其中一八二五、二七、二八、二九年，皮爾遜的年薪均維持為一千三百鎊，一八二五、二七、二八年則除了一千三百鎊外，還增加生活津貼一千元。自一八三三年起，皮爾遜不再出現在薪資名單中，該年度的醫生是加律治。加氏最初在英國東印度公司擔任助理醫生，一八三三年升任醫生；參見美·馬士著，區宗華譯，林樹惠校，《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第2冊第3卷，頁249；第3冊第4、5卷，頁116, 155, 176, 200, 360。

⁴⁰ William C. Hunter,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1882; repr.,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p. 31. 作者 William Hunter 提到一八二五年任職於東印度公司的醫生是 Pierson 與 Colledge，承梁其姿教授賜告 Pierson 即 Pearson 的誤寫。

⁴¹ Wong and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p. 281-282.

⁴² 范行準根據《在華基督教備忘錄》，指出傳教士羅存德曾重譯《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但因嘶噹唻的譯本「國內或已失傳，羅氏的譯本，更不必說了」；見范行準，《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頁149-150。據伍連德與王吉民的說法，羅存德於一八四八年來華，一八五五年以中文出版皮爾遜原書《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的修訂本；見 Wong and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 282. 此外，范行準誤植羅存德是「德人耶穌教士」（感謝陳慧宏教授提醒），經查羅存德（Wilhelm Lobscheid）原籍英國，是德國禮賢會（Rhenish Missionary Society）教士；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頁291。

⁴³ 范行準，《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頁148-149。

因當時「總督對行商與艦長伍德大為動怒」，故中方未予理會。⁴⁴直到一八一一年四月十六日，嘶噹唛在覲見新上任的兩廣總督松筠時，才乘便再獻上此書，松筠滿意的收下。⁴⁵

協助《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刊行的鄭崇謙自乾隆六十年（1795）起執掌會隆商行，⁴⁶以鄭侶官（Gnewqua）為商名。嘉慶九年（1804），鄭崇謙以鄭芝茂之名，由捐職州同加捐提舉職銜。鄭崇謙執掌會隆行期間，先後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大班哆琳咬與喇佛（John William Roberts）交易多年。⁴⁷既然鄭崇謙與哆琳咬之間有密切的貿易關係，且當時西洋事物傳入中國，往往需透過行商做為媒介，故哆琳咬與皮爾遜乃尋求鄭崇謙協助，將英國新出種痘法及其文本傳入中國。

鄭崇謙除了襄贊《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的出版之外，還招募多人向皮爾遜學習西洋種痘術，其佼佼者之一，就是後來寫作《引痘略》的南海邱燾。⁴⁸根據《南海縣志·藝文略》〈按語〉（1835），嘉慶十年到道光十五年間，當地從最初的幾人學習西洋種痘法，達到「人精其業」的盛況，⁴⁹此語或許過於誇大，但卻可見按語作者亟力讚揚鄭崇謙推廣西洋新法之首功。誠然，在鄭崇謙的協助之下，西洋種痘新法始順利傳入中國，這位曾經風光一時的富商是繼劉德章兄弟之後，引進西洋種痘法的先驅之一，其貢獻不容抹煞。

雖然《南海縣志·藝文略》〈按語〉盛讚鄭崇謙推動西洋種痘法的首功，但是鄭氏協助出版的《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卻較隱沒不彰。究其原因有二：一則或因該書中譯本不甚流暢，⁵⁰中國讀者的接受程度受限；一則或因鄭崇謙晚年

⁴⁴ 美·馬士著，區宗華譯，林樹惠校，《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第2冊第3卷，頁15。

⁴⁵ 同前書，頁165；Wong and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 278. 馬士提到嘶噹唛呈送總督的書名是 *History of Chinese of the Vaccine Inoculation*，據伍連德與王吉民之說，則應是《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從之。由於松筠曾陪同馬嘎爾尼使節團南歸，與嘶噹唛為舊識，因而樂意接受《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

⁴⁶ 乾隆五十八年（1793），鄭尚乾承充會隆行行商，兩年後鄭氏亡故，由其子鄭崇謙繼承；參見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頁249；楊國楨，〈洋商與大班〉，頁9。

⁴⁷ 當鄭崇謙發生財務困難時，喇佛曾代出資本並代管行務；見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頁249-250。

⁴⁸ 《南海縣志》（道光十五年）卷二五，〈藝文略〉，頁55；《光緒廣州府志》卷一六三，〈雜錄四〉，頁40。

⁴⁹ 《南海縣志》（道光十五年）卷二五，〈藝文略〉，頁55。

⁵⁰ 夏鼎指出：「鄭書之所以失傳，實由於譯筆生硬，敘述種痘法欠詳」；見夏鼎，〈西洋種痘法初傳中國補考〉，頁343。范行準也認為嘶噹唛翻譯的《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

悲慘的境遇，以致於罕有持續響應或再版者。嘉慶十五年（1810），鄭崇謙因破產入獄，次年，發配伊犁，兩年後病故。⁵¹ 由於鄭氏下場淒涼，後繼無人，他所助刊的《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遂較不爲人所知。《南海縣志·藝文略》〈按語〉指出鄭崇謙歿後，「後嗣式微，遂有竊其書而增益之以問世者，不復舉崇謙名氏也」，⁵² 字裡行間難掩不平之慨。彭澤益根據此條，認為邱熺或有竊取鄭崇謙助刊的《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之嫌，並考證鄭崇謙才是中國接受西洋種痘法之傳始人，而夏鼎卻爲邱熺辯護，主張邱氏雖然受到《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影響，但「全書大部分確是邱氏自序所說的：『爰取其法之歷驗者條述之』」。⁵³ 事實上，鄭崇謙只是協助《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譯本之潤飾與出版發行，該書的原作者是皮爾遜，因此鄭崇謙與《南海縣志·藝文略》〈按語〉作者影射的「竊書者」邱熺《引痘略》之間，不存在抄襲或剽竊的問題，⁵⁴ 而在十九世紀牛痘傳華史上，鄭崇謙與邱熺兩人均各有其貢獻。

除了上述兩項因素之外，《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在中國逐漸隱沒不彰的原因，不免與稍後出版之邱熺《引痘略》的盛行有關。相較之下，由於《引痘略》出自於中國痘師手筆，文筆相對地順暢，內容平易，對中國讀者來說既具親切感，又有可讀性，確較易於流傳；其次，自《引痘略》出版以來，獲得許多商人、士人與官吏大力的支持與推廣，傳播更遠；第三，在各方的財力襄贊之下，《引痘略》與善書一樣，採取免費贈閱的方式，並依循善書流通的管道發行與傳布，讀者更多。⁵⁵ 反觀需要花費「紋銀二分」購買之《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

「尚沒有一般人的通順」，「為那時文人如沈壺之流所不滿」；見范行準，《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頁149-150。

⁵¹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頁247-251。

⁵² 《南海縣志》（道光十五年）卷二五，〈藝文略〉，頁55。

⁵³ 彭澤益，〈西洋種痘法初傳中國考〉，頁203-208；〈廣州洋貨十三行行商倡導對外洋牛痘法及荷蘭豆的引進與傳播〉，頁73-83；夏鼎，〈西洋種痘法初傳中國補考〉，頁343。

⁵⁴ 近年來有關著作權、功勞、版權等議題的討論，參見 E. J. Clery, C. Franklin, and P. Garside, *Authorship, Commerce and the Public: Scenes of Writing, 1750-1850*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Mario Biagioli and Peter Galison, eds., *Scientific Authorship: Credi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Scienc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3).

⁵⁵ 相關的討論，參見張嘉鳳，〈鬼子之法——牛痘在十九世紀中國〉，發表於「明清至近代漢人社會的衛生觀念、組織與實踐」研究計畫討論會（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研究所，2003年4月7日）。

書》，⁵⁶ 顯然是較不能吸引讀者的；第四，皮爾遜與邱熺採取不同的觀點與策略，介紹與推廣西洋種痘新法，對兩者所寫的文本之流通與消長，更具決定性的影響，關於這一點將在下節詳論。

《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譯成中文之後，不久便傳至日本與朝鮮。據筆者所見，日本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至少典藏兩個版本，第一種是天保辛丑年（1841）由伊藤圭介校刻刊行，更名為《啖咕喇國種痘奇書》（花繞書屋藏本）；⁵⁷ 第二種是廣瀨元恭校刊的版本，收錄於《新訂牛痘奇法》（時習堂藏本），嘉永二年（1849）仲冬出版。除了少數幾個字不同之外，伊藤圭介本和廣瀨元恭本與亞非學院本相同，但伊藤圭介本所錄的圖式中，「臂形」部分有文無圖，而廣瀨元恭則是把《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更名為《新訂痘種奇法》，並與他的其他牛痘著作合編成《新訂牛痘奇法》。廣瀨氏蒐錄的《新訂痘種奇法》僅存原版的文字部分，略去原書四幅圖式，另外繪製「種痘針式」、「取苗圖」、「種苗圖」與「蓄痘漿玻璃板式」四圖，其中唯「種痘針式」與《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之「外科小刀」相仿。⁵⁸ 此一《新訂痘種奇法》曾被桑田立齋收錄於《牛痘發蒙》的種痘書目中，題為「西洋鄭崇謙刊，京都廣瀨元恭校刊」，⁵⁹ 似乎刻意地凸顯鄭崇謙襄助英國種痘新法在中國傳播的功績。

朝鮮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七集〈麻科會通〉卷六收錄《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更名為《新證種痘奇法詳悉》，與亞非學院本之內文標題〈新訂種痘奇法詳悉〉僅一字之差，丁氏或有意為該書正名。丁若鏞收錄之版本係道光八年琉璃廠橋西路北奎光齋刻字鋪所刻，「每本工價紋銀二分」，僅存「臂形」、「象牙小簪」與「外科小刀」三圖，缺「痘形」圖。今本《新證種痘奇法詳悉》內文脫漏頗多，刊印者在缺漏之處標以空白，明示讀者缺字。⁶⁰ 值得注意的是，

⁵⁶ 《與猶堂全書》，第7集，頁25。

⁵⁷ 日・伊藤圭介（錦窠）校刻，《啖咕喇國種痘奇書》（大阪：杏雨書屋藏花繞書屋藏本〔1841〕，昭和十二年〔1937〕小西謄寫堂覆刻，吉川芳秋編輯暨發行）。

⁵⁸ 《新訂牛痘奇法》，頁1-2。廣瀨元恭《新訂牛痘奇法》之圖式、語言與內容，亦有將牛痘在地化的企圖，此與清末邱熺《引痘略》恰有異曲同工之妙，值得日後再做深入的研究。

⁵⁹ 日・桑田立齋，《牛痘發蒙》（1849，大阪：杏雨書屋藏驅痘館藏本），〈種痘書目〉。

⁶⁰ 《與猶堂全書》，第7集，頁23-26。

道光七年（1827），奎光齋亦曾鐫刻與發行《引痘略》，⁶¹ 可見十九世紀初葉先後在廣東出版之《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與《引痘略》幾乎同時在北京的書肆再版與問世，供讀者自由選擇閱讀。據此，則《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在華發行概況，並不如范行準所說的那麼有限，此書傳至日本與朝鮮的事實，亦可證明其有一定的流通量。

根據《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記載，新法傳入中國時，「本國醫生協同澳門醫生照法栽種，華夷童稚，不下百數，俱亦保全無恙」，可見澳門人很快地接受英國種痘新法。⁶² 誠如趙洪鈞與梁其姿所言，中國「遠非頑固不化拒絕外國文化知識」，⁶³ 對這項來自西洋的新技術並未排斥，⁶⁴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英國種痘術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受到澳門人的青睞，實與當時正值天花流行有關。⁶⁵

一八〇五至〇六年，雖然接種英國種痘新法的華人不在少數，但這項新法並未在中國紮下穩固的根基，當天花疫情稍緩之後，此一新法好像被遺忘了，許多父母未依約帶領子女前來檢驗是否種出真痘，或不願讓醫生從種出之痘中取苗，加上夏、秋兩季人們缺乏接種的意願，終於導致疫苗中斷，⁶⁶ 使得英國東印度公司不得不再從菲律賓群島、爪哇（Java）與安汶島（Amboyna）引入活苗。疫苗的傳遞與保存問題，是十九世紀英國新法在各地傳播過程中所面臨的難題，中國的情況亦然。⁶⁷ 直到一八一〇至一一年間，在中國行商的資助之下，種痘活動才又

⁶¹ 《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醫家類》第1012冊所收錄的《引痘略》，就是清道光七年丁亥（1827）琉璃廠西門內中間路北奎光齋印行的版本。《續修四庫全書》版本的封面題有：「引痘新詠附刻」，但現存版中卻不見此部，且未見售價。

⁶² 一八〇六年六月，曾在中國旅行的 John Barrow 將《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中譯本寄給咕嚕，並告知新種痘法在中國成功施種的概況，而 Farington 也指出中國人甚至比英國人更有準備地能接受新種痘法；參見 Wong and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 278.

⁶³ 趙洪鈞，《近代中西醫論爭史》（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頁55。

⁶⁴ 根據梁其姿的研究，十九世紀中國士紳與商人「經過人痘法的免疫觀念洗禮百年後，很快、很自然地接受了來自西方的牛痘。……因此，說中國對這項新事物有慣常性的排斥，是沒有根據的」；見梁其姿，〈明清預防天花措施之演變〉，頁252。

⁶⁵ Wong and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 278.

⁶⁶ 清·李福泰修，史澄、何若瑤等纂，《（重脩）番禺縣志》（Cambridge, MA: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哈佛燕京圖書館] 藏同治十年〔1871〕光霽堂刊本），卷五四，〈雜記二〉，頁21-22；Wong and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 279.

⁶⁷ 十九世紀，英國種痘新法在華傳播的過程中，頗受接種的技術、取苗與疫苗失效或短缺之擾，從而影響接種者的信心、觀感，以及牛痘的推廣，關於這一重要議題，日後再撰

在洋行公所 (Cansoo House) 重張旗鼓，從此在廣東奠定較堅實的基礎。⁶⁸

繼《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之後，爲了推廣新種痘法，陸續有中文相關著作出版，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黃安懷《西洋種痘論》與邱煒《引痘略》。黃安懷字信齋，籍隸南海，嘉慶二十年（1815）端陽日，黃氏於「小有清虛精舍」完成《西洋種痘論》。嘉慶十年，黃安懷聞知「夷醫」「獨取夾白一穴」的種法時，「嘗惜中國不得其傳，爲之扼腕」。⁶⁹ 現存《西洋種痘論》有文無圖，作者以相當短的篇幅說明天花起源與傳染概況、鼻苗法原理、種法及其流弊，並介紹啖咭喇種痘法的來歷、原理、種法與成效，同時也比較鼻苗法與西洋新法。更重要的是，黃安懷以在地的眼光詮釋西法，將之安頓在中國的傳統中。從文本出版時間的先後來看，黃氏的在地觀點比邱煒更爲早出，黃邱二人的創造與轉化，表現十九世紀初中國人理解與接受西洋種痘法的典型，其意義在於爲日後西法在中國的傳播定下基本調性。

《西洋種痘論》版藏於廣東省城學院衙門前聚賢堂，最初或以宣傳小冊的形式發行，但刊刻與發行量均或有限。現存版本至少有兩種，一是完整版，一是節錄版，後者刪除天花起源與傳染概況、鼻苗法原理、種法及其流弊的內容，直接從西洋種痘法的傳入談起。據筆者所見，《西洋種痘論》之完整版收入嘉慶二十年出版、道光元年（1821）再版、道光七年又重刊的《西洋痘書》中，⁷⁰ 也見於光緒十八年（1892）出版的《臍風牛痘要言數則》。⁷¹ 至於《西洋種痘論》的節錄版，則分別見於道光八年出版的《西洋點痘論》⁷² 與賀縉紳刊刻之《平江賀氏

專文詳論。至於鼻苗接種法的取苗與疫苗保存概況，參見范行準，《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頁116-123；邱仲麟，〈明清的人痘法——地域流佈、知識傳播與疫苗生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7.3（2006）：451-516。

⁶⁸ 《南海縣志》（道光十五年）卷四四，〈雜錄二〉，頁30；《光緒廣州府志》卷一六三，〈雜錄四〉，頁40。王吉民與伍連德認為一八一五年中國行商領袖才聚資提供免費種痘服務；見 Wong and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p. 279-280.

⁶⁹ 清·邱煒，《引痘題詠》（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道光三年〔1823〕本），卷上，頁6。

⁷⁰ 清·邱煒，《西洋痘書》（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嘉慶二十年〔1815〕鐫，道光元年〔1821〕又鐫，道光七年〔1827〕重刊，版藏廣東省城雙門底書坊味經堂並發兌，南海林述之刊送，宜章周純熙刷送一千部）。

⁷¹ 清·寄廬主人編，《臍風牛痘要言數則》（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光緒十八年〔1892〕鐫），頁7-13。

⁷² 邱煒，《西洋點痘論》（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道光八年〔1828〕刻本）。

彙刻醫書》下冊。⁷³ 不論是完整版或節錄版，現存《西洋種痘論》未見單行本，皆收錄於綜合性牛痘著作之中，可見後來的刊刻者往往將之視為一篇序言，而非一本專著。相對於《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與《引痘略》，《西洋種痘論》的流通量與知名度更為有限。

嘉慶二十二年（1817），邱燊（Hequa）出版《引痘略》，是現存華人寫作的西洋種痘法專著中流通最廣者，後人撰寫與西洋種痘法相關之著作，大多以《引痘略》為藍本，或收錄之，或刪節之，或增廣之，因此，《引痘略》是十九世紀影響中國最深遠的種痘文獻。海內外現存的《引痘略》版本相當多，依據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統計，中國境內至少有六十二種版本存世。⁷⁴《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在《引痘略》條目之下所登錄的版本，乃是那些仍保留原作者、原書名與原書內容的單行本，但各版本往往因編者與贊助刊行者的不同，或加入新的序跋或圖式，或將痘局條約附錄前後，或將邱氏另一編著《引痘題詠》（圖一）附錄書末，不一而足。事實上，還有許多收錄《引痘略》的著作未收入《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的《引痘略》之下，這些書籍均完整地保留《引痘略》的原文與原序，惟原書圖式多有因革，此類文本還可再細分成三種類型：其一，增加新的序跋、圖式、痘局章程等，並更改書名出版；⁷⁵ 其二，增補與闡釋《引痘略》不足或疏略之處，並以輯錄增修者為名出版，書名亦多變更，且另有他人做序；⁷⁶ 其三，將《引痘略》與其他相關文本共同輯成一書，以其他書名出版。⁷⁷ 由此可見，《引痘略》發行版本與數量之眾，⁷⁸ 與流傳有限且多不為人所知的《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西洋種痘論》恰成強烈的對比。

⁷³ 清·賀縉紳編，《平江賀氏彙刻醫書》（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光緒四年〔1878〕刻本），下冊，頁1-4。

⁷⁴ 薛清泉主編，《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1），頁517-518。據悉修訂版將於二〇〇七年底問世，或有新資訊補充。

⁷⁵ 例如道光十四年（1834）經國堂藏本重鐫的《引痘新法全書》（北京：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圖書館藏），與咸豐二年（1852）致和堂重鐫之《引痘新法全書》（北京：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圖書館藏）即是；又如光緒二年（1876）出版的《引痘秘書》（邱燊原著，仁靜山校刊，李汝霖補輯，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藏光緒二年〔1876〕皖省痘局藏本），亦以《引痘略》為主體，「增入尺式三焦穴四圖、原序六篇、新訂章程十四條」而成。

⁷⁶ 譬如查道倫認為：「嬰兒之有病無病，必視三關耳紋為準」，遂在他輯錄的《引痘集要》中，「爰輯其說，補入是圖，并添以兒科引用各方，庶引種之際不致率爾奏刀，其他則詳於邱氏說，不敢復贅一詞」；見《引痘集要》，〈自序〉，頁1。

⁷⁷ 例如徐忭仁編輯，並由三農老人註釋的《增訂婦嬰至寶》（北京：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圖

《引痘略·自序》作於嘉慶二十二年，⁷⁹ 現存最早的刊本有溫汝适（1754-1820）序（1817）與五幅圖像（圖三），分別是「手少陽三焦經圖」、「種牛痘穴分圖」、「種痘刀式」、「取痘漿象牙小簪式」與「執刀式」，隨後則是正文。正文依序為：〈引痘說〉、〈首在留養苗漿〉、〈次在認識瘋疾〉、〈引泄法〉、〈度苗法〉、〈出痘時宜辨〉、〈出痘後須知〉以及〈方藥〉八部，其中〈方藥〉一項，又分成「治痘損破膿水不止」、「治痘潰爛」、「治痘潰爛流血不止」、「治痘破成坑不能合口」、「治痘後諸瘡」、「治痘疔」、「治痘風癬」和「治餘毒紅腫」八類。⁸⁰ 無論就圖式與文字數量來看，《引痘略》均比《嘆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為多，但兩書均採取先圖後文之排列原則。

「言簡意賅，習是業者無不奉為圭臬」的《引痘略》不僅「初止行於楚豫間，繼而風行江南」，⁸¹ 還先後傳至日本與朝鮮，譬如日本小山肆成與春堂牧先後校刊《引痘略》，冠以《引痘新法全書》之名出版。據筆者所見，目前日本杏雨書屋藏有三部小山肆成《引痘新法全書》、一部春堂牧校刻之《引痘新法全書》，⁸² 以及嘉永二年（1849）桑田立齋編纂的《引痘要略解》（思位軒藏本）⁸³ 三部。至於《引痘略》傳入朝鮮的概況，除了池錫永編纂《牛痘新說》（1865）⁸⁴

書館藏道光二十四年〔1844〕鐫，版藏蘭州浙江會館），即是將《達生篇》《種痘法》與《引痘略》合輯一書；光緒十二年（1886），陳賢榮將邱煊《引痘略》與其師趙開泰《牛痘三要》合梓為《重刊邱趙牛痘書》（1886，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浙寧西門鋤經齋鐫），並自附餘論一篇於後。

⁷⁸ 《引痘略》問世之後，以上述諸多形式不斷地重刻或翻印，由於這些重刻本仍保留原作者邱煊的姓名，而那些書名變更或經他人增刪潤飾的版本，亦皆清楚地標示與區分出原作者與修訂者的姓名，因此，透過《引痘略》的例子來看，十九世紀中國的醫療技術著作的原作者與內容，並不會因翻刻或重印而遭到惡意的抹滅或抄襲。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當時《引痘略》的流通近似於善書，作者與助印者都歡迎各界翻印與重刻，以廣其傳，與現代的保護著作版權之觀念不同。

⁷⁹ 本文主要引用的《引痘略》，係清道光七年丁亥（1827）琉璃廠西門內中間路北奎光齋印行的版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醫家類》第1012冊。

⁸⁰ 《引痘略》（道光七年），頁399-417。

⁸¹ 《引痘集要》，〈自序〉，頁1。

⁸² 日·小山肆成校，《引痘新法全書》（大阪：杏雨書屋藏天保十三年〔1842〕翻刻，平安東風館藏本）；日·春堂牧，《引痘新法全書》（大阪：杏雨書屋藏弘化三年〔1846〕出版，九畹室藏梓）。

⁸³ 日·桑田立齋編輯，《引痘要略解》（大阪：杏雨書屋藏嘉永二年〔1849〕思位軒藏本）。

⁸⁴ 朝鮮·池錫永，《牛痘新說》（大阪：杏雨書屋藏李太王自序〔1865〕活字刊本）。

收錄《引痘略》之外，首爾大學奎章閣亦度藏一八七四年本立堂重鐫的邱熺《引痘新書》。

雖然廣東府縣地方志多記載牛痘傳華概況，且亦多提及邱熺姓名，⁸⁵ 但對於其一生行誼卻付之闕如，⁸⁶ 所以，吾人只能從現存的有限材料中，拼湊出邱熺的生平梗概。邱熺字浩川，廣東南海人，生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⁸⁷ 卒於咸豐元年（1851），⁸⁸ 至少育有一子。⁸⁹ 根據邱熺的窗友葉大林所述，邱熺早年業儒，「少有異資」，曾追隨陳姓老師學習，陳師對邱熺「一見而器重之，謂此子他年必有所就」。邱氏既而別業從商，「偶遊澳門，因得夷人種痘善法」。⁹⁰ 邱熺自稱「少時未出天花，洋醫為予種時年三十二歲」，⁹¹ 「身試果驗，泊行之家人戚友，亦無不驗者」，⁹² 當時為邱熺種痘的洋醫就是皮爾遜。⁹³ 稍後，在商人鄭崇謙的招募之下，邱熺跟隨皮爾遜學習種痘。⁹⁴

嘉慶二十二年，邱熺在《引痘略》自序中強調：「此法予得之最先，且行之無誤」，自詡之意昭然若揭。由於邱熺種痘有成，並隨著西洋新種痘術與《引痘略》的傳布日廣，再加上溫汝适為《引痘略》作序時亟稱：「獨邱君詢得其詳，

⁸⁵ 《光緒廣州府志》卷一六三，〈雜錄四〉，頁40；清·阮元等纂，《廣東通志》（1822，臺北：臺灣書店，1959），卷三三一，〈雜錄一〉，頁5684。

⁸⁶ 陳垣曾引述《邱氏家傳》，該書或載有較詳細的邱熺傳記，可惜筆者未能得見此書，而陳垣對《邱氏家傳》的介紹甚少，僅提到「夷醫跛臣」教導邱熺種痘術而已，「跛臣」即是皮爾遜；參見陳垣，〈牛痘入中國考略〉，頁218。

⁸⁷ 根據《引痘略》自序，嘉慶十年，邱熺以三十二歲之齡接受種痘，據此推算，邱氏應出生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

⁸⁸ 清·邱昶，〈補序〉（1862），收入清·邱熺，《繪圖引痘心法全書》（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光緒八年〔1882〕埭葉山房校刻本）。

⁸⁹ 邱熺長子邱昶，字長樂，又字蔭庭，克紹箕裘，亦以種痘為業。根據同治十一年（1872）秋出版的《引痘略合編》，邱氏長房孫計有柏樞、柏蘭、柏材、柏樑、伯桐與伯芝六人，曾孫有錫麟、錫璋與錫琮三人，元孫則有應瑞一人。參見《引痘略合編》（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同治十一年〔1872〕渝城都郵街文古堂刻本），第2冊，《引痘題詠》，頁47。又，根據光緒八年（1882）校經山房刊行的《繪圖引痘心法全書》（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邱氏長房孫依序為：伯樞、柏蘭、柏材、伯樑、伯桐與伯芝六人，曾孫為：錫麒、錫璋、錫琮，元孫之名則相同；見頁1。

⁹⁰ 清·葉大林，〈七截并序〉，收入《引痘題詠》卷上，頁12。

⁹¹ 《引痘略》（道光七年），頁407。

⁹² 同前書，〈自序〉，頁403。

⁹³ 陳垣，〈牛痘入中國考略〉，頁218。

⁹⁴ 同前註。

驗之果效，遂傳其方，活人無算」，後人遂多稱邱熺為第一位傳種牛痘的中國人，例如道光八年，郭尚先稱邱熺「首得其傳」；⁹⁵ 道光十八年（1838），黃安敏所做的序言，也認為「牛痘之傳，始於邱浩川先生」。⁹⁶ 然而，根據《光緒廣州府志》的記載，與邱熺一起學習西洋種痘者，還有梁輝（1763-1819）、⁹⁷ 譚國與張堯三人，「其後梁返黃埔，張歸翠微，邱、譚兩人遂擅其技」。⁹⁸ 為何四人之中唯邱熺獨享盛名？陳垣指出兩點原因，第一是因邱熺著有《引痘略》一書，其次是該書受到當時士大夫之攸揚。⁹⁹ 夏鼎認為邱熺著作之所以盛行，乃是「文筆順暢，說理清晰，並且糅入中醫學說，又根據自己的經驗，敘述詳盡」。¹⁰⁰ 誠如陳氏與夏氏之見，後人多奉邱熺為牛痘法的鼻祖，確得力於《引痘略》的推廣與流傳。更重要的是，邱熺站在中國本位立場重新為西洋種痘法定位的作法，更是獲得士大夫、官吏、商人與種痘師共鳴的關鍵，也是西法廣為接受的主因之一，關於這一點，筆者將在下節詳論。

邱熺居住廣州城西，¹⁰¹ 距離十三行不遠。邱氏受聘於由「洋行好善諸公」資助的洋行公所（會館）為人種痘，「人稱種痘師」。¹⁰² 根據梁嘉彬的研究，洋行公所在故衣街北，外國人稱之為 Cansoo House。¹⁰³ 廣州洋行公所痘局的設立，使西洋種痘法的推廣更為機構化與制度化，是日後牛痘在其他地區推廣的重要典範。廣東洋行公所最早開始提供種痘服務的年代不詳，但可確知的是，其間

⁹⁵ 清·郭尚先，〈序〉（1828），收入《引痘略合編》（同治十一年），第1冊，頁8。

⁹⁶ 黃安敏，〈增補引痘圖說〉（1838），收入清·邱熺，《引種牛痘方書》（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光緒二十年〔1894〕江西書局刻本），頁27。

⁹⁷ 梁國熾字輝，黃埔人，「聞西人有種牛痘法，……國熾乃重金購其法習之。痘漿必由西洋傳遞而至，費不貲，國熾無所吝，止以其法治之，不吝分文謝，至今人人知種痘得免痘患，自國熾倡之也」。此段文字見於同治十年（1871）重修的《番禺縣志·列傳》，但卻與《南海縣志》、《光緒廣州府志》的記載不一。由於《番禺縣志》的〈梁輝傳〉採自梁同新所寫的《家傳》與《採訪冊》，梁氏子孫之作不免溢美先人；見《（重脩）番禺縣志》卷四七，頁10。

⁹⁸ 《光緒廣州府志》卷一六三，〈雜錄四〉，頁40。

⁹⁹ 陳垣，〈牛痘入中國考略〉，頁220-221。

¹⁰⁰ 夏鼎，〈西洋種痘法初傳中國補考〉，頁343。

¹⁰¹ 梁鶴鳴，〈右集毛詩二十章四句〉，收入《引痘略合編》（同治十一年），第2冊，《引痘題詠》，頁41-42。

¹⁰² 清·梁信芳，〈五言〉，收入《引痘題詠》卷下，頁11。

¹⁰³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頁290。

至少曾經兩度中斷。¹⁰⁴ 廣州洋行公所痘局的免費種痘服務，夏季以每八天為一期，春、秋、冬三季則以九天為一期為人種痘，週而復始，風雨不改。凡在四至九月之間來接種者，¹⁰⁵ 痘局還酌予「菓金」，以保障苗漿來源不斷。¹⁰⁶ 廣州洋行痘局免費接種與設立「菓金」的策略，往後各地痘局或慈善機構多仿效之，這是牛痘在中國得以推廣與傳播的主因之一。¹⁰⁷

邱熺並非唯一受聘在廣州洋行公所的種痘師，根據《南海縣志》、《（重脩）番禺縣志》與《光緒廣州府志》的記載，牛痘傳入粵東之初，洋行商人鄭崇謙招募梁輝、邱熺、張堯與譚國四人學習新法為人接種，但因「粵人未大信，其種遂失傳」，¹⁰⁸ 一直到嘉慶十五、十六年間（1810-1811），才由洋行商人伍敦元、潘有度與盧觀恆捐資，重新聘請邱熺與譚國負責種痘。¹⁰⁹ 稍後，種痘所遷往叢桂里三界廟西偏。¹¹⁰

嘉慶二十二年《引痘略》出版，邱熺指出：「經予手所種小兒，不下萬千，皆根基長養，以至娶妻生子，不能悉數」。¹¹¹ 除了在洋行公所種痘之外，邱熺也曾應邀到府種痘，此類的服務對象，主要是官貴子弟，例如溫汝适為《引痘略》寫序時，指出方伯曾公與學使傅公曾先後延邱熺至署中種痘，「奏效如神」；¹¹² 道光二年（1822），客居南海的史善長在戚友慫恿之下，「遣僕通其

¹⁰⁴ 第一次肇因於疫苗供應中斷，直到一八一〇至一一年間，在中國行商的資助之下，種痘活動才又在洋行公所重張旗鼓。王吉民與伍連德認為一八一五年中國行商領袖才聚資提供免費種痘服務。根據《光緒廣州府志》的記載，一八五一至六一年間，痘局事業又因經費不足而間斷；見《南海縣志》（道光十五年）卷四四，〈雜錄二〉，頁30；《光緒廣州府志》卷一六三，〈雜錄四〉，頁40；Wong and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p. 279-280.

¹⁰⁵ 四到九月之間前來接種牛痘者較少的原因，或與鼻苗接種法的接種習慣有關。關於鼻苗法的接種時機，參見邱仲麟，〈明清的人痘法〉，頁484-487。

¹⁰⁶ 《引痘略》（道光七年），頁407-408。

¹⁰⁷ 相關討論參見 Chia-Feng Chang（張嘉鳳），“Aspects of Smallpox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Histor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6), pp. 160-168；〈鬼子之法〉。

¹⁰⁸ 《南海縣志》（道光十五年）卷四四，頁30。

¹⁰⁹ 《光緒廣州府志》卷一六三，〈雜錄四〉，頁40；《南海縣志》（道光十五年）卷四四，頁30。

¹¹⁰ 《光緒廣州府志》卷一六三，〈雜錄四〉，頁40。

¹¹¹ 《引痘略》（道光七年），頁407。

¹¹² 清·溫汝适，〈序〉，收入《引痘略》（道光七年），頁401-402。

意」，延請邱熺為其兒孫種痘，「次第如其法治之」。¹¹³ 邱熺應邀到府種痘的活動，至少持續到他逝世前四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邱氏應花縣知縣張崇恪之邀，為其子姪種痘，十分成功，張崇恪請邱熺留在署中月餘，命其弟張崇樹留心學習。¹¹⁴

邱熺在洋行公所種痘的薪資由公所支給，¹¹⁵ 而前來接受種痘者則一律免費。邱氏《引痘略·自序》云：「未嘗以此取人絲毫之利」，可見邱氏受聘外出種痘亦不索謝。道光三年（1823），邱熺出版的《引痘題詠》亦可以為證。¹¹⁶ 《引痘題詠》匯集滿漢縉紳達貴與仕女題贈的詩文，雖然邱熺不索錢財為謝，但卻向受惠者及其親屬「索誌數言」，「以信其傳」，¹¹⁷ 於是「一時名流題詠幾遍」，¹¹⁸ 其較著名者，例如兩廣總督阮元（1764-1849）、廣州布政使曾燠（1760-1831）、廣東巡撫康紹鏞、廣東學政傅棠與國子監學正宋葆淳等。至晚從嘉慶十九年（1814）開始，¹¹⁹ 邱熺就有意識地蒐集各方的題贈，十年之間累積百餘篇，不愧是善於推廣牛痘新法的能手，更是提升自我形象與地位的宣傳家，表現出邱氏個性之一端。邱熺此舉的確發揮效果，道光元年鄭兆珩閱讀上述兩書之後，不僅據此相信與祝福邱氏「後嗣必繁衍昌熾，引無極焉」，且「時方從事于粵東通志，乃採其事入雜錄」，並為重刊的《引痘略》寫序。¹²⁰

邱熺嫡傳弟子的人數不少，但留名於史傳者卻不多，其中之一是前述的張崇樹。道光二十七年，張崇樹奉其兄張崇恪之命，向邱熺學習種痘術。張崇樹字建

¹¹³ 《引痘題詠》卷下，頁23。

¹¹⁴ 清·張崇樹，〈續刻引痘略序〉，收入《引痘略合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道光二十七年〔1847〕督察院左都御史文慶題字本），頁3-4。

¹¹⁵ 邱熺在洋行公所種痘的薪資暫無資料，不過，同治十三年（1874），滋德堂施種牛痘局聘請痘師駐局，「每年修銀八十兩，按三、四、五三個月付清，不得預支」，或可參考；參見《引痘條約合梓》，頁31。

¹¹⁶ 最近有關《引痘題詠》的研究，參見 Dong Shaoxin（董少新），“Qiu Xi and Yin dou ti yong” (paper presented in the conference of “Celebrating 200 Years of Smallpox Vaccines in Macau,” The Macau Inter-University Institute, January, 2006)；〈論邱熺與牛痘在華之傳播〉，頁138-139。

¹¹⁷ 《引痘題詠》卷下，頁23。

¹¹⁸ 清·溫汝适，〈序〉，收入《引痘略》（道光七年），頁402。

¹¹⁹ 《引痘題詠》卷上首列曾燠題贈之「勿藥有喜」四字，時間是嘉慶十九年九月；見《引痘題詠》卷上，頁1。

¹²⁰ 清·鄭兆珩，〈序〉（1821），收入《西洋痘書》，頁1。

侯，著有《引痘略續篇》一部，¹²¹ 根據〈附經驗記〉，同治十年（1871）張氏「度苗四川迄今已十數年矣」。¹²²《引痘略續篇》由張氏之子張景、堂弟張崇翰與學生林映濂、林雨霖、吳祚奎與彭承先一同校勘出版，¹²³ 可見張崇樹種痘之餘，亦從事教學活動。

邱熺的嫡傳弟子見諸於文獻者尚有陳碧山。道光十年（1830），在福建任官的顏敘功邀請邱熺種痘，邱氏因家事不克離粵，遂遣弟子陳碧山攜乾苗入閩，但因苗力失效不驗，經過多次往返無效之後，改雇種痘嬰兒沿途傳漿接種，次年正月十六日始獲成功。¹²⁴

道光七年，丹徒王惇甫，字新吾，就幕楚南時，執贄謁見楊煦生。楊煦生，湖南善化人，是邱熺的第四代傳人。當時與王惇甫同門從游者共十三人，除了外地來的休甯程茂遠、漢陽傳達尊、歙縣汪徵遠之外，其餘都是湖南人士。¹²⁵ 此外，當塗黃安敏客居淮揚時，也曾向楊煦生學習牛痘種法，黃安敏寫成〈增補引痘圖說〉的時間，是在道光十八年，這時黃安敏已接受蕪邑豐備義倉的邀請，設局種痘有年，「大江南北所種不下千百人，罔不應手奏效」。¹²⁶ 另據王惇甫之說，豐備義倉痘局創於道光十四年（1834），¹²⁷ 可見從嘉慶二十二年到道光十四年十餘年間，邱氏種牛痘法在江南至少已傳衍五代，且取效頗稱卓著。

除了收授生徒之外，邱熺也將種痘技術傳給長子邱昶。邱昶字長樂，又字蔭庭，邱昶追隨父親種痘達數十年之久，道光二十七年，應潘仕成之邀，¹²⁸ 邱昶

¹²¹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有一部《引痘略合編》（道光二十七年），其內容是將《引痘略續篇》與《引痘略》以及部分的《引痘題詠》，合刊為一書（感謝梁其姿教授提供此書），書首有督察院左都御史文慶於道光二十七年題贈之滿文，此外並無其他出版資訊。

¹²² 清·張崇樹，《引痘略續篇》（收入《引痘略合編》〔道光二十七年〕），頁64-65。

¹²³ 同前書，頁60。

¹²⁴ 清·顏敘功，〈序〉，收入《引痘略合編》（同治十一年），第1冊，頁10-11。顏敘功字遜齋，與邱熺同為南海人，由於顏氏昆季與邱氏交善，遂延請邱熺入閩種痘。

¹²⁵ 清·王新吾，〈後牛痘序〉，收入王新吾重輯，《牛痘新書》（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光緒三年〔1877〕嚴州府重刊本），頁4。

¹²⁶ 清·黃安敏，〈增補引痘圖說〉（1838），收入《引種牛痘方書》（光緒二十年），頁27。

¹²⁷ 〈敘〉，《引種牛痘新書》，頁3-4。

¹²⁸ 潘仕成（1800-1873?），字德畬，一字子韶，道光十二年（1832），順天鄉試副榜貢生，道光十七年（1837），特旨授兩廣鹽運使；見朱萬章，〈潘仕家族與嶺南刻帖〉，唐文雅主編，《廣州十三行滄桑》（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2001），頁132。

攜帶乾苗前往北京設局傳種，並授徒五人，停留十個月之後，返回廣東。邱昶在北京種痘效果良好，「公卿延譽，稱為聖手」，督察院左都御史文慶稱其「得其尊人浩川公種洋痘法，行於粵省數十年矣」，¹²⁹ 並以滿文「功深保赤」贈與邱昶，陳官俊（偉堂）則以「種用刀圭常勿藥，拈來妙手自生春」十四字題贈邱昶，「用以誌保赤子之誠求云」。¹³⁰ 稍後，邱昶受廣西孫荃雲之邀，再以類似的模式前去設局種痘。¹³¹ 邱熺過世之後，同治元年（1862），兩廣督憲勞崇光與洋商伍紫垣在廣東重設痘局，¹³² 由邱昶繼承父業主持種痘。¹³³

邱熺寫作《引痘略》的目的，乃是「俾嬰兒不罹天花之厄，共嬉游於光天化日中也」，¹³⁴ 歷經四十餘年的種痘生涯，邱氏所造福的人數何止「累百盈千」，¹³⁵ 貢獻卓著。根據邱昶的回憶，邱熺臨終之時，「猶諄諄以牛痘一事，使昶永其傳，並諭以後世子孫毋或失墜」，¹³⁶ 可見邱熺不僅將牛痘術當作一生的志業，更期望能成為邱氏家族永續不朽的事業。¹³⁷

¹²⁹ 《引痘略合編》（同治十一年），第1冊，頁25-28。

¹³⁰ 同前書，頁25-28, 34。又，陳官俊曾將邱熺《引痘略》傳至萊蕪；參見清·崇倫，〈序〉（1848），收入清·邱熺，《引痘略》（上海：上海圖書館藏道光二十八年〔1848〕客花草堂刻本）。

¹³¹ 清·邱昶，〈補序〉（1862），收入《繪圖引痘心法全書》（埽葉山房校刻本），頁又7。

¹³² 勞崇光（1802-1867），字辛階，諡文毅，湖南善化人。道光十二年（1832）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道光三十年（1850），出任廣西布政使，咸豐九年（1859）升任廣東巡撫，咸豐十年（1860）擔任兩廣總督，同治二年（1863）任雲貴總督。

¹³³ 邱昶，〈補序〉，收入《繪圖引痘心法全書》（埽葉山房校刻本），頁又7。廖育群引用江國霖的序言指出，道光二十七年，邱熺曾應邀「至都中四傳種法」；見廖育群，《歧黃醫道》，頁231。經查同治十一年的《引痘略合編》，江國霖在咸豐九年（1859）所寫的序言中，前往北京四傳種法的是邱昶，並非邱熺；見頁5。此外，同治元年（1862），制府勞崇光札諭惠濟義倉歲撥銀約百五十兩，仍聘邱昶分董之事，亦見於《光緒廣州府志》卷一六三，〈雜錄四〉，頁40。

¹³⁴ 《引痘略》（道光七年），〈自序〉，頁404。

¹³⁵ 同前文，頁403。

¹³⁶ 邱昶，〈補序〉，收入《繪圖引痘心法全書》（埽葉山房校刻本）。

¹³⁷ 從其長子邱昶率子六人、孫三人與元孫一人同校再版的《引痘略》來看，邱熺後人確曾努力以不負先人臨終的叮嚀；見清·邱熺，《引痘略》（收入《繪圖引痘心法全書》〔埽葉山房校刻本〕）。

三・《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西洋種痘論》與《引痘略》的比較與分析

《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西洋種痘論》與《引痘略》皆以介紹西洋種痘法為主旨，但《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在清末的發行之量、影響力與知名度，均遠不如《引痘略》，而《西洋種痘論》更是敬陪末座，鮮為人知。由於這三部書的內容與書寫策略互有同異，前者是英國人原著，經中文翻譯之後在華出版；後二者乃中國人所寫，具備濃厚的本土色彩。三者的成書時間或前或後，圖文內容有同有異，刊印版本和數量有多有少，傳播與流通或滯或暢，受到仕紳與一般人歡迎的程度或深或淺。因此，透過比較並分析他們的書寫目的、策略與內容的異同，不僅可凸顯其個別的特色，更能藉此探尋十九世紀初期西方醫療技術傳華的動態風貌、中國人如何看待西學的態度，以及此一態度如何影響西學之傳播。

學者指出十九世紀中國人接受西洋種痘法的主因有二：一則是因他們對舊有鼻苗法的熟悉，¹³⁸ 一則是支持者將西法定位為慈善事業，免費施予接種。¹³⁹ 除此之外，筆者認為新法之所以能傳播日廣，《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與《引痘略》二書的出版與發行亦功不可沒，尤其是《引痘略》。根據許多為《引痘略》及其增訂本寫序者的現身說法，他們刊刻此書的目的，不外乎推廣新法與傳承技術，作為廣設痘局布種與薪傳的依據，¹⁴⁰ 而許多人之所以接受西法種痘，多因曾閱讀過《引痘略》。¹⁴¹ 此外，若干牛痘局訂定的條約，亦鼓勵人們刊印《引痘略》，使「窮鄉僻壤皆知種法」。¹⁴² 由於《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與《引痘略》二書在十九世紀的發行較廣，影響較深，且其作者均實際參與種痘活動，因此以下的討論以此二書為主。

¹³⁸ Wong and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 276; 梁其姿，〈明清預防天花措施之演變〉，頁251。

¹³⁹ 廣東洋行商人協助英商引進新種痘法之初，就將之視為慈善事業，不但釀金設館，免費施種，更設立「菓金」贈與取漿之人，使痘苗來源穩定。相關研究，參見 Chang, "Aspects of Smallpox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History," pp. 160-168; 張嘉鳳，〈鬼子之法〉。

¹⁴⁰ 紹誠，〈序〉(1874); 任道鎔，〈序〉(1874); 古畚氏，〈序〉(1831)，均收入《引痘條約合梓》。

¹⁴¹ 朱方增，〈序〉，收入《引痘略》(道光七年)，頁399-400。

¹⁴² 《引種牛痘新書》(1863)，頁18。

《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與《引痘略》不單是宣傳西洋新法的手冊而已，更是新手初學的範例與教本，這是兩書的共同特色之一。《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詳細介紹接種的技術與工具，接種之後的反應，痘苗的保存，以及如何辨明真痘與偽痘，進而決定是否須重種等。如此詳盡的書寫，筆者認為其目的有三：第一，新法來自西洋，為使華人不因陌生而畏懼或抗拒，故特予詳述，以獲得信任和支持，並為英國人爭取好的形象；第二，藉由瞭解接種過程與接種以後的逐日發展，使接種者安心，並提高人們對西法的接受程度；第三，作者將種痘技術鉅細靡遺地公開給讀者，目的在使人易於學習與操作，尤其是書首繪製的四幅圖像，更是希望讀者能按圖索驥，「依法栽種」。此外，《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扉頁云：「啖咕喇公司行內現有象牙簪、痘種與外科小刀，如種痘者凡到此處，一問便知」，看來啖咕喇公司除了為人種痘之外，也提供種痘所需的疫苗與工具，更不吝公開西法技術，處處展現該公司推廣新法的積極用心。

《引痘略》圖文並舉，詳述取得、應用與保存種痘苗漿的方法，並介紹種痘的工具和步驟、種痘之後各日的發展與變化，以及如何辨識真偽痘等，與《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一樣，也在教人按圖索驥，學習種痘技術。由於《引痘略》文字淺顯流暢，比《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更易於學習與流通，再加上牛痘支持者、慈善家與受患者不斷地在江南各省翻刻與發行，¹⁴³ 使《引痘略》之傳播、發行量與重要性遠遠超越其他的種痘文本，成為牛痘技術的正統教本。光緒二年（1876），〈皖省痘局·牛痘局條約〉，明訂「牛痘之法人人可學，處處可傳」的原則，「有願學者按期到局，以便指點部位、用刀之法，藝精後，局送書（《引痘略》）一本、刀一把」，¹⁴⁴ 可見《引痘略》被視為學習、教育與宣廣牛痘的典範文本。

《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與《引痘略》的另一項共同點，在於兩者都刻意以挪用中國傳統天行正痘與鼻苗法話語的形式，將西洋種痘新法納入人們所熟悉的語言與文化情境之內。譬如《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所使用的「栽種」，《引痘略》採用的「播種」、「苗」，以及兩書皆用的「種痘」一詞，其實均採借自鼻苗法。站在宣導新法第一線的兩位種痘師皮爾遜與邱燿，巧妙而不著痕跡的利用舊法，在沖淡人們對西洋新技術陌生感的同時，透過相似事物的類比，使人對西法產生熟悉感與好感，使新法在鼻苗法仍然盛行江南之際，取得一席之地。

¹⁴³ 清·王惇甫，〈敘〉（1863），收入《引種牛痘新書》，頁3-4。

¹⁴⁴ 《引痘秘書》，頁37。

除了援引鼻苗法的話語來介紹與推廣西洋種痘新法，《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與《引痘略》又不約而同地採取新舊比較的書寫策略，彰顯西法的優勢。《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云：「曾有醫書種法尚未盡善盡美，……以至殞命，並損手足耳目，甚至服藥調治者，亦不知何許」，但新法卻能「隨種隨效」。《引痘略》則是將牛痘接種法與古痘苗塞鼻孔法相比，認為古法「必五臟傳遍始能發熱」，「苗氣必歷五臟層遞而入，內毒亦必歷五臟層遞而出」，「猶失十一於千百，未能操券而十全也」，而牛痘透過手少陽三焦經直傳而入，「以佳苗而引胎毒」，一齊將胎毒「引挈而出，如引路然，引諸坦途」，故西法「萬無一失」，「斷無致死之理」。藉由比較新舊、中西二法，皮爾遜與邱熺都在說服讀者改就新法。

再者，《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與《引痘略》皆透過比較天行正痘與新種痘法，強調新法的優越、安全與便捷。皮爾遜指出「西邊之國」遭遇天行痘患時，「或損兄弟，或損兒孫」，「若僥倖存命，或痘癰疾於耳目手足，難以枚舉」，且天花之症甚多，「能傳染於人，而牛痘之症非種不行」，若依新法栽種，「牛痘種在於所種之處，只出一顆，如小指頭大」，且隨種隨效，「能解散人痘之毒」，「永可防有染天花之患矣」。《引痘略》則認為天行之痘「為小兒一大病……人人尚思遠避」，種牛痘猶如「捕盜」與「去莠」，「乘其羽翼未成，就而擒之甚易矣」，「及其滋蔓未延，芟而除之甚易矣」，既無須如出天行正痘者一樣延醫服藥、舉家日夕守視或多方調護，更不必飽受驚恐或求神問卜。¹⁴⁵ 相較於皮爾遜，邱熺更著墨於接種牛痘之後，小兒嘻笑和飲食一切如常的優點，強調小兒可省去疾苦，而家長亦可省卻憂勞，「法誠善也」。邱氏之所以能針對天行正痘與鼻苗法種後繁瑣的照護過程而發，正是因為他深諳傳統社會習慣，故能直接對掌握小兒種痘權的父母或其他家長進行勸說，比《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更具親和力與說服力。

¹⁴⁵ 有關古代痘神的崇拜、信仰與儀式的研究，參見 Chang, "Aspects of Smallpox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History," pp. 102-121; 王振忠，《徽州社會文化史探微——新發現的16-20世紀民間檔案文書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頁265-291。邱熺強調接種牛痘安全無虞，不要求神問卜，雖然目前難以確知邱氏是否因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而有此說（感謝周伯勤教授提示此一可能性），但可確知的是，並非所有的牛痘種師均與邱熺觀點一致，譬如鄧旒（1774-1842）主張接種牛痘時須設立痘房，安放「峨嵋仙醫」與「咕哪師真」牌位；見楊家茂，〈牛痘初傳我國史略及其意義〉，頁84。

《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與《引痘略》均以作者的親身經驗或見聞為證，強調新法的實際效驗，鼓勵人們前來接種。皮爾遜詳述新法在英國發明與檢驗效果的經過，並舉出新法傳播各國之後，「男女大小數百餘萬，無一損傷，無一復出」，以及此一「靈妙之法」傳入澳門以來，「華夷童稚，不下百數，俱亦保全無恙」的事實，才敢將「目擊屢效之法」輯成一書，「傳行於世」。邱燾則是在《引痘略》自述三十二歲時，毅然在「人未之信」的氣氛中試用新法，成功之後，不但「行之家人戚友，亦無不驗者」。其次，在邱氏最初為人種痘的十數年間中，「凡問途接踵而至者，累百盈千，無有損失」，「若非身試無誤，敢以人為戲乎」，遂「敢筆之於書，以質之於世，爰取其法之歷驗者條述之」。皮爾遜與邱燾透過個人的經歷，見證與推廣西洋新法的宣傳策略，被後來宣揚新法者所繼承，從《引痘略》各版的序跋作者常以自己或親友的成功案例做為訴求，可以為證，¹⁴⁶ 由於這些作者是官吏、士人、鄉紳或種痘師，以他們的身分與地位登高一呼，不僅能博得人們對於陌生西法的信任，也能收風行草偃之效，使更多人接納西洋種法。

《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與《引痘略》的書寫策略，都是先鋪陳西洋新法的淵源，再透過新舊接種法的比較，烘托出西法卓越之處。皮爾遜指出「及至前百餘年，曾有醫書種法」，「如遇天行時，將好痘者用小刀取其痘漿，刺在未出痘者臂上，俟數日痘隨此出」，但缺點在於「不能盡善，以致殞命，並損害手足耳目」。皮爾遜接著細述英國醫生咕嚕發現新法的經過與接種的效果：

今本國啖咭喇有蓄牛取乳者甚多，時即嘉慶元年，本國遇值天行，遭經遍戶，紛紛傳說，惟蓄牛取乳者不染天花，各聞為異，適有醫生名咕嚕者，國內聲名昭著，頗稱濟世良醫，見遭天花之患不可勝數，常欲明達救濟之法，隨即往視，果見搗牛乳者不染天花之奇，是以堅意細察，見牛奶及奶頭、奶傍之處有小藍疱，形類如痘，細猜牛痘，莫非能解散人痘之毒乎？隨即想法與人試種，或能減卻天花之原，亦是美事。於是與人種試，果經

¹⁴⁶ 例如道光八年，曾望顏之兒孫接種牛痘，與道光十七年（1837）陳煦延請包厚村為獨子種痘，兩例均獲成功之後，曾、陳二人遂大為信服，並為《引痘略》重刊本作序；參見《引種牛痘方書》（光緒二十年），頁3、9。又如道光十八年，黃鉞指出：「（牛痘）其妙殆不可思議，今自設局以來三年，於茲余家男女曾孫九人，及所識親友大江南北不下數千餘人，經所謂十全為上者是矣」；同前書，頁6。

所種之人，隨種隨效，每自初種至第四日，始露形影，及至八九日滿漿，至十四日靨脫全愈。¹⁴⁷

《引痘略》對於啖咕喇新種痘法發現經過的敘述，不但比皮爾遜簡略，同時還加以改寫，邱燦云：

外洋向無此疾，後由他處傳染，患亦滋多。惟蓄牛取乳之家獨不沾染，醫人欲窮其故，見牛乳旁有青藍小疱，形與痘類，因悟牛之患痘必輕，以之傳人必然無害，於是按古針刺法，取牛痘之漿，種人兩臂消燂、清冷淵二穴，旬日果於所刺之處隨出數顆，按日灌水，按日滿漿，按日結痂落靨。¹⁴⁸

皮爾遜談及種法時只說要「平刺皮膜」，既未言及「古針刺法」，更無所謂「種人兩臂消燂、清冷淵二穴」之說。但是，當新法到了自稱「素不知醫」的中國痘師邱燦筆下，「啖咕喇國新出種痘新法」搖身一變為「牛痘」，與傳統中國醫學中的經脈學說與針刺之法緊密結合。經過邱燦的改頭換面之後，「牛痘」形同在地化與中國化的產物，從此而後，中國論牛痘者皆以邱燦的新說馬首是瞻。

邱燦將「啖咕喇國新出種痘新法」改寫與轉化為「牛痘」，一方面表現邱燦個人對西洋新法的全新理解，以中國文化為唯一的價值與思考中心，重新詮釋牛痘；另一方面則是為了實際的宣傳需要，在西洋新法傳華初期「人未之信」的環境下，將新法與中國傳統醫學綰繫，再藉由喚起人們對於傳統醫學與文化的熟悉感，為新法爭取國人的認同和信任。此後，邱燦的「牛痘」新說隨著他個人成功的種痘生涯，與《引痘略》的不斷傳布刊刻，成為往後牛痘支持者發揮「在地化」與「西學中源」論述最重要的基礎之一。

《引痘略》繪製「手少陽三焦經圖」與「種牛痘穴分圖」兩圖（圖三），充分表露他對牛痘的新詮釋。「手少陽三焦經圖」乃是「按銅人圖尺寸」，繪出一小兒全像，手執長竿，上面懸掛葫蘆，面帶微笑，狀如嬉戲，小兒左上臂畫出消燂、清冷淵二穴的位置，一旁還有文字提示。「種牛痘穴分圖」亦是一小兒全像，手裡拿著一個題有「平安如意」字樣的花瓶，瓶口插著如意，雙手上臂各畫出兩個圓點，應即消燂穴與清冷淵穴，與《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臂形圖（圖二）僅在上臂畫出一點之圖式不同。《引痘略》與《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接種部位之別，代表雙方對於西洋種痘法原理的理解不一，從而反映出中西醫學及

¹⁴⁷ 《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頁2-3。

¹⁴⁸ 《引痘略》（道光七年），頁405。

其身體思維的基本差異。透過圖像的宣傳與潛移默化效果，邱燐繪製的種痘穴位圖，更能呼喚人們對傳統醫療文化的熟悉度與親切感，引導讀者從中國本位的文化中理解與接受西洋新法。同時，圖像讓人一目瞭然的功能，使牛痘法更易於接受、學習與教學，從而增進其普及的程度。

《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強調「牛痘種在於所種之處，只出一顆，如小指頭大」，「不拘左右手」，種痘之後九日，臂上的痘形即如「痘形」圖所示一般。¹⁴⁹ 然而，在受過皮爾遜親自教導的邱燐轉寫之後，《引痘略》轉而依循傳統脈學的性別原則與鼻苗種法的習慣，亦即「男左女右」，並訂出「男先左，女先右」的接種順序，¹⁵⁰ 分別在兩臂的消爍與清冷淵穴種痘，一共四顆。同時，邱燐還強調八、九歲以上的兒童，因「日啖腥膩五味，恐或有後天之毒，則於兩穴上下相連之處中間，更各種一顆」。¹⁵¹ 邱燐此說源自傳統痘科醫家的見解，明清醫家多主張「五辛六辣之物，腥羶煎燂之味，釀成胎毒」，¹⁵² 並主張胎毒是導致天花的主要內因，¹⁵³ 浸淫在這樣的醫療文化和氛圍之下，且為了謹慎起見，邱燐主張成童須再多種兩顆。無論是種下四或六顆，都是邱燐糅合傳統醫療文化所發明的新主張。

邱燐雖謙稱「素不知醫」，卻服膺傳統醫學的天花病因說，將天行痘歸因於胎毒與時氣，主張「痘之為毒，受於先天，感於時氣，散於經絡」。¹⁵⁴ 同時，邱燐《引痘略》還以吳謙編纂《醫宗金鑑》與張琰（遜玉）《種痘新書》的見解為依歸，比較「古痘苗塞鼻孔法」與牛痘法，並解釋牛痘何以比古法便捷有效，從而宣揚牛痘新法的優點。例如《引痘略》認為古痘苗塞入鼻孔之後，苗氣從外

¹⁴⁹ 《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頁4-5。

¹⁵⁰ 鼻苗種法遵循「男左女右」的原則；參見清·朱純嘏，《痘疹定論》（1713，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乾隆三十二年〔1767〕味經堂重刊本），卷二，頁25；清·毓蘭居士輯，《種痘要法》（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道光二十三年〔1843〕萬卷堂鐫），頁4。

¹⁵¹ 《引痘略》（道光七年），頁409。

¹⁵² 清·馮兆張，《馮氏錦囊秘錄·痘疹全集》（1694，臺北：五洲出版社，1987），卷一，頁1。

¹⁵³ 有關中國古代天花病因說的發展與變遷，參見 Chia-Feng Chang, “Dispersing the Foetal Toxin of the Body—Conceptions of Smallpox Aetiology in Pre-modern China,” in *Contagion: Perspectives from Pre-modern Societies*, ed. Lawrence Conrad and Dominik Wujastyk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0), pp. 23-38.

¹⁵⁴ 《引痘略》（道光七年），頁406。

向內在五臟間傳遞，依序是：肺、心、脾、肝、腎，當苗氣到達骨髓之後，再循原路引毒而出。此一五臟層遞的順序本於《醫宗金鑑》；¹⁵⁵ 至於天行正痘之毒，在感於時氣之後，胎毒由內而外的傳經次序是「由腎而肝而心而肺而脾」，¹⁵⁶ 則是源自張琰《種痘新書》。¹⁵⁷ 根據上述，邱熺對牛痘的新解，顯然是站在傳統痘科醫學的基礎上，進一步創造轉化而來。

立足於傳統痘科醫學、鼻苗種法的理論與臨床之上，邱熺自創由消燦與清冷淵兩穴接種疫苗，從此將西洋牛痘安身於傳統醫學之中：

三焦者人身最關要之腑，如天地之三元，總領五臟、六腑、營衛、經絡，通內外、左右、上下之氣。三焦通，則內外、左右、上下皆通，得其關要之處引之，直從皮毛、血脈、肌肉、筋絡同時直傳而入，使縱有胎毒身藏於腎，亦自然引挈而出，如引路然，引諸坦途，則無顛躓之患；如引絲然，引其端緒，則無焚亂之憂。《金鑑》所謂引其毒於未發之先者，即此意；張遜玉《種痘新書》所謂以佳苗而引胎毒，斯毒不橫而症自順者，亦此意也。故凡種痘皆用引法，而引毒從皮毛、血脈、肌肉、筋絡同時而出，則牛痘最為捷也。¹⁵⁸

經過以上的闡釋，邱熺既能繼承與發揮傳統脈學與氣論的觀點，宣稱牛痘與古痘苗塞鼻法同出一系，巧妙地為來自外洋的牛痘穿戴傳統醫學的衣衫，「變夷原用夏」、「用夷變於夏」，¹⁵⁹ 爭取更多的認同與支持。於此同時，邱熺亦藉助於傳統痘科醫學理論，呈現牛痘與鼻苗法類似之「引毒」的本質，為書名《引痘略》正名，相較於「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引痘」一詞本身就已充滿傳統的風味。

讀者若詳閱《引痘略》，不難發現邱熺特別看重顏色。邱氏認為「看痘」是種痘師在臨床操作時重要的技術之一，而痘色更是判別種痘成功與否的標準，¹⁶⁰

¹⁵⁵ 清·吳謙等編纂，《醫宗金鑑》（1742，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8），卷六〇，頁123，總頁1549。

¹⁵⁶ 《引痘略》（道光七年），頁406。

¹⁵⁷ 清·張琰，《種痘新書》（1741，收入《新輯中西痘科全書》〔臺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77〕），卷四，頁2。

¹⁵⁸ 《引痘略》（道光七年），頁406-407。

¹⁵⁹ 「變夷原用夏」、「用夷變於夏」之語實出於邱熺的同儕左履泰與黃喬松之口；參見《引痘題詠》卷下，頁10, 12。

¹⁶⁰ 《引痘略》（道光七年），頁410-411。

尤其在選苗的關鍵時期，所種之痘必須是「色若真珠寶光」的「佳苗」，不宜採用「痘色淡白而無寶光」者。¹⁶¹ 在〈出痘時宜辨〉一節中，邱燿指出刺引之後第九、十日，「漿轉黃蠟色」，半月之外，脫落的痘靨必須光澤堅厚，種痘才算成功。¹⁶² 邱氏指出假痘的特徵，是「灌漿如黃白膿者」、「色淡白」、「暗而無寶光」、「結靨黃而薄」，必須補種。以上觀點，都是邱燿秉持與遵循「天行之痘，醫家先論成色」傳統原則的結果，於是《引痘略》與中國在地的醫療傳統更加接近。

《引痘略》特別側重痘師看痘的功力，與種痘之後的痘色變化，這一點在《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中並非完全無跡可尋，至少後者曾出現以「漿水白色如膿」判斷偽痘的文字。然而，為何邱燿再三強調顏色的重要性？這並非來自於偶然的靈感或突發奇想，作為《引痘略》與《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分道揚鑣或劃清界限的書寫策略，而是邱氏在傳統小兒與痘科醫療文化中沈浸日久的必然結果。歷來治痘醫家均強調看痘的臨床技能，以及痘形、痘色的重要性，¹⁶³ 痘色不僅可藉以判斷患者受毒的深淺，更能預測患者的死生。¹⁶⁴ 向有「啞科」之稱的兒科，「自古為最難」，根據《醫宗金鑑·幼科心法要訣》，小兒「氣血未充難據脈，神識未發不知言，惟憑面色識因病」，¹⁶⁵ 故傳統醫學的望、聞、問、切四診之中，小兒以察色為先，醫者也以「望」為主要的臨床技巧。曾經兩度在《引痘略》中徵引《醫宗金鑑》的邱燿應深諳此說，遂有意識地將傳統小兒與痘科醫學的元素帶入牛痘新種法之中。另外一方面，藉由痘師看痘的關鍵角色，邱燿巧妙地強調臨床專業技巧的重要性，以提高種痘師的地位。

《引痘略·出痘時宜辨》述及種痘之後出痘的過程時，依照日程，分別敘述刺引以後第一二日、第三四日、第五六日、第六七日、第八九日、第九十日以及

¹⁶¹ 《引痘略》（道光七年），頁408-409。

¹⁶² 同前書，頁410。

¹⁶³ 《馮氏錦囊秘錄·痘疹全集》卷二，頁12-13。

¹⁶⁴ 清·程雲鵬（鳳雛），《慈幼新書》（1644，臺北：旋風出版社，1973），卷四，頁9；清·孟河（介石），《幼科直言》（1726，臺北：旋風出版社，1973），卷一，頁4。

¹⁶⁵ 《醫宗金鑑》卷五〇，頁7，總頁1265。明朝著名小兒醫萬全（1499-1582）之〈小兒正訣指南賦〉亦云：「小兒方術，號曰啞科，口不能言，脈無可施，惟形色為憑」；見明·萬全，《萬密齋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7），頁376。有關萬全的生平與著作，參見毛德華，《萬全生平著述考》（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半月之外的發展歷程，¹⁶⁶ 點明出痘各日之形色、外觀、大小與軟硬品質，以及種痘者的身體感。這樣的敘述形式，實亦採擷自傳統醫學。明代以降，痘科醫學發展日趨複雜而精緻，醫者漸能歸納患者出痘各日的規律，作為判斷生死與治療的重要依據之一。¹⁶⁷ 邱燦在〈引痘說〉一節曾引用張琰《種痘新書》，而張氏在討論「痘症傳變」時，即是依循明清痘科醫學的常用模式，依序從第一、二日到十一、二日，逐日解說痘由內向外發散的身體概況，¹⁶⁸ 此一傳統原則顯然也為邱燦所繼承。

一般來說，醫學著作都是醫者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寫作，鮮少述及病人的身心感受，即使有，也只是一種轉述。但邱燦在〈出痘時宜辨〉一節，卻舉出「如蟻咬」、「微微覺癢」和「兩腋底微疼」的身體感，顧及了接種者的感受，與傳統醫學文本不同。究其原因，正如他在〈出痘時宜辨〉結尾所說的：「予身曾親歷，故知之更詳」。傳統醫家看痘與治痘時，重點在查察出痘的部位與顏色判別吉凶，對病患身體感絕少著墨。由於邱燦曾經種痘，經歷過患者的角色，故能設身處地形容種後種種的身體感與變化。邱氏這種不同於傳統以醫者為中心來論述身體感的方式，¹⁶⁹ 預先將各階段的感覺告知接種者，應能使人有心理準備，提高其接種的意願，並能安撫已接種者，使其了解接種之後的身體感。同時，邱燦現身說法指出種痘過程中的身體感，或能引發曾接種者的高度共鳴，以徵實信，從而獲得更多的口碑，以利新法的宣揚。

除了上述諸點之外，傳統醫學與文化的影子，在《引痘略》中往往俯拾即是。例如邱燦宣示「慈幼」的著書目的，正與歷代小兒醫學典籍著作之初衷若合

¹⁶⁶ 《引痘略》（道光七年），頁410。

¹⁶⁷ 譬如明朝醫者張介賓有「發熱三朝辨吉凶」、「報痘三朝辨吉凶」、「起發三朝辨吉凶」、「灌膿三朝辨吉凶」、「結靨三朝辨吉凶」與「落痂後辨吉凶」之說，分別敘述出痘一日到十五、六日間的日程發展；見氏著，《景岳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6），卷四三，頁517-520；又如馮兆張有「痘出約日法」，說明痘初發起一日到十三日間在五臟的傳變；見《馮氏錦囊秘錄·痘疹全集》卷四，頁7。

¹⁶⁸ 《種痘新書》卷四，頁2。

¹⁶⁹ 有關古代病人身體感的研究，參見 Chia-Feng Chang, "When the Patient Becomes A Doctor: A Case Study on the Zhegong Manlu (Random Notes on Broken Limb, 1635)" (paper presented in the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Medicine, and Technology in East Asia, Deutsches Museum, Munich, 2005).

符節；¹⁷⁰ 又如《引痘略》提出一份由種痘之初到灌水時期的飲食宜忌原則與清單，提醒接種者避免誤食。明清時期，一般論及痘疹的醫書，多載有出痘期間飲食之宜忌，而飲食與食禁向來即是傳統醫學、本草學重要的一環，¹⁷¹ 至於飲食與疾病生成的因果關係，更早在古典的《黃帝內經·素問》業已申明。此外，明清時期的日用類書、黃曆與通書，亦不乏飲食禁忌的篇章。長期深受傳統文化薰陶的邱燊，遂不免「自然而然」地將飲食宜忌納入《引痘略》之中。不僅如此，這項文化因子早在《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已見端倪，該書最末附有兩行字，寫下種痘之後可用與禁用的食物品項，由於這兩行字是以低於本文一格的方式書寫，顯然不是英醫皮爾遜的原文，而是出於助譯或協助刊行的中國人之手。到了《引痘略》，邱燊更詳列食物品名及其性味功能，供接種者與讀者參考。此外，《引痘略》最後還臚列各種方藥，供種痘師與接種者臨證取用，這項貼心的作法，恰與若干鼻苗種法文本的書寫形式和策略一致，¹⁷² 既能符合人心未雨綢繆之需求與期望，進一步保障接種者的性命安全，又能展現正統醫學的適時介入，暗示文本作者與種痘師具備「知醫」的本色，博取更多的信賴。

值得注意的是，《引痘略》雖藉由比較牛痘與古鼻苗法的書寫策略，彰顯牛痘的優勢與效果，但邱燊並未因此大力貶抑或詆毀古法，¹⁷³ 反倒是認為「牛痘之理原包於種痘諸法之中」，視牛痘與古鼻苗法同出一系，藉此將牛痘安插在傳統痘科醫學的系譜之內。不惟如此，遍覽《引痘略》原序與正文，不難發現邱氏呈現與表述牛痘新法的方式，多假借、仿效與挪用自古鼻苗法，較之《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引痘略》實有過之而絕無不及。例如古鼻苗法痘師稱痘種為

¹⁷⁰ 尤其是明清時期的小兒醫學著作，作者往往以「慈幼」、「保嬰」作為著作的主要目的，這一點只須觀察這些醫籍的書名或序跋即可窺其一斑；見《慈幼新書》；清·吳寧澗，《保嬰易知錄》（1812，收入曹炳章編，《中國醫學大成績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第39冊）。

¹⁷¹ 近年來有關飲食與食禁，及其與醫藥、本草關係的討論，參見陳元朋，《舉箸常如服藥——本草史與飲食史視野下的「食藥如一」變遷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

¹⁷² 《痘疹定論》卷三，頁21-39。

¹⁷³ 過去的學者論及十九世紀以降鼻苗法與牛痘法在中國的發展時，多強調兩者之間的競爭關係。觀乎比《引痘略》後出的牛痘文本或再版之他人序跋，確實常見提倡新法者尖銳地批評與詆毀鼻苗舊法，指出鼻苗痘師只為顧及自身利益而阻礙新法。但是，《引痘略》原文與原序卻未刻意輕蔑或抹黑鼻苗種法或鼻苗痘師。關於此一議題，容後再撰文詳論。

「苗」，並認為「苗」之所以能將胎毒引導於外，在於苗中之「氣」；到了牛痘種師邱熺之手，則稱牛痘種為「苗」，並以「其『氣』達於三焦之經，血氣相感，自然取效」說明牛痘苗引痘的原理，又以「鮮漿得『氣』較全」誇讚其效驗。同時，邱熺還以「乾苗法」命名取代鮮漿種痘法，其靈感或來自於鼻苗法之「旱苗法」。¹⁷⁴ 尤有甚者，邱氏還舉出另一項「佳苗之鑿」替代法，更似直接學習鼻苗法之「水苗法」，且邱熺在此節的陳述方式與語言，與「水苗法」的傳統敘述幾近一致。¹⁷⁵《引痘略》採借或挪用鼻苗種法語言的寫作策略，不僅是在醫學技術的傳統與脈絡之中，將牛痘提昇到與鼻苗法同等高度而已，更要進一步彰顯牛痘的優越。

邱熺不僅將牛痘鑲嵌入傳統醫學與鼻苗法的脈絡／語境中，還以五行與感應的觀念為「牛痘」正名：

痘何以曰牛也？痘之種自牛來也。……蓋牛土畜也，人之脾屬土，以土引土，同氣相感，同類相生，故能取效若此，痘種自牛而來，故曰牛痘也。¹⁷⁶
 嘶噹啍翻譯《啞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之際，書名的重點在強調「啞咭喇國」和「新出」，寄望中國人因此對英國心生好感與感激，未以「牛痘」為新法定名。然而，在邱熺的眼裡，啞咭喇新法卻藉「牛痘」新名而改頭換面，與中國的傳統思想和文化接榫，這樣的書寫策略與語言，正是將牛痘在地化的具體表現。

為了進一步因應在地的環境與需求，《引痘略》第二節〈次在認識瘋疾〉云：

粵東地勢卑濕，不無瘋疾，來種痘者，恐一同混雜，誤取其漿，傳之無疾小兒，危害不淺。以此告知洋行諸公，呈請有司派令養濟院認識瘋疾之人，具結存案，逢期到局伺候。凡來種者，先令驗過，然後取苗，自無貽誤。¹⁷⁷

由於當時廣東地區確有不少瘋疾患者，且人們普遍相信此疾具有傳染性，¹⁷⁸ 邱

¹⁷⁴ 關於鼻苗接種法的疫苗問題，參見邱仲麟，〈明清的人痘法〉，頁481-487。

¹⁷⁵ 《醫宗金鑑》卷六〇，頁122，總頁1548。有關古鼻苗法的接種原理、技術與儀式，以及種痘師的研究，參見 Chang, "Spects of Smallpox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History," pp. 124-159.

¹⁷⁶ 《引痘略》（道光七年），頁405。

¹⁷⁷ 同前書，頁408。

¹⁷⁸ 鄭蔡等纂，《南海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宣統二年〔1910〕刊本影印，1974），卷四，頁15。有關中國古代癲瘋的相關研究，參見蔣竹山，〈明清華南地區有關癲瘋病的民間療法〉，《大陸雜誌》90.4（1995）：38-48；梁其姿，〈中國癲瘋病概念演變的歷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0.2（1999）：399-438。

燭遂針對瘋疾採取事先防範的措施。雖然邱燭在此節只顧及廣東一地的現況，所關照的地理範圍，相對於整個中國來說或略顯狹隘，但卻能彰顯牛痘傳入廣東之初華人因地制宜所做的調整與努力。

《引痘略》不斷再版的盛況，對照《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在華有限的發行星，顯示邱燭將牛痘在地化的新說確為國人所接受，而這一點正是《引痘略》出版之後，牛痘新法在華能較以往順利傳播的關鍵。自《引痘略》大行之後，牛痘在華之傳播進入嶄新的階段。《引痘略》採借或挪用傳統醫學、思想與鼻苗種法語言的寫作策略，充分展現了邱燭個人的中國本位立場，隨著《引痘略》不斷的重刻與翻印，邱燭在十九世紀支持牛痘者心目中的正統地位亦逐漸確立與穩固，而邱氏對牛痘的重新詮釋，更為此後的牛痘支持者提供一種合理化與正當化的基礎。然而，與當時許多採「西學中源」說面對西學的人士相比，《引痘略》並未直接提出西洋種痘法根源於中國之說，而是將西法視為與中國固有的鼻苗法同出一系，原理一致，兩者均能引出先天痘毒，惟牛痘法更具效力而簡便。

邱燭通過在地的目光，選擇性地觀看與重新詮釋來自啖咭喇的種痘新法，並非一朝一夕的即興創作，而是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與觀摩。嘉慶二十年，為了推廣初來乍到的西洋種痘新法，廣東省城味經堂發行《西洋痘書》，歷經數度增訂改版，現存道光七年重鑄本將作者題為邱燭，並以嘉慶二十二年出版的《引痘略》為該書之主體。雖然目前已不見《西洋痘書》初版的原貌，所幸周純熙為道光七年本寫序時，道出歷次改版的過程：

此書自嘉慶乙亥年（1815）新鑄，其論說與藥方尚未全備。丁丑年（1817）略增數條，猶未盡善。至道光辛巳（1821）繼出一帙，未免詳後略前，今將三次所刊彙成乙冊，公諸同志。¹⁷⁹

若周純熙之說可信，且道光七年《西洋痘書》之原版即《引痘略》前身的話，則《引痘略》初成於嘉慶二十年，嘉慶二十二年時，邱燭在「論說」與「藥方」兩項略有修訂與補充後出版，道光年間又再度增訂。

道光七年出版之《西洋痘書》將《引痘略》內文首篇題作〈西洋痘說〉，而嘉慶二十二年《引痘略》之內文首篇則題為〈引痘說〉，兩篇內容相同，但標題不同。由於今本《西洋痘書》亟可能保留了《引痘略》初版或較早版本的原樣，

¹⁷⁹ 《西洋痘書》，頁1。

因此觀察兩個版本所選用的「引痘」與「西洋痘說」之間用詞的微妙差異，亦可一窺邱熺從「西洋種痘新法」走向「牛痘」的歷程。「引痘」一辭帶有濃厚的傳統醫學色彩，而「西洋痘說」僅強調西法之新出及其淵源，兩項標題之取捨與更動之間，應經過一番斟酌，最後以〈引痘說〉定案，顯然是有意將西洋新法融入中國的醫學文化脈絡中。再者，若從這兩部書的命名也可細察其間的變化，先行出版的《西洋痘書》強調新法從西洋而來，稍後發行的《引痘略》則已富含傳統醫學的在地氣味；《西洋痘書》的命名格局，與《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較為接近，而《引痘略》的命名基調，卻與《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漸行漸遠。由此可見，歷經兩度增訂改版，邱熺乃有意識地且逐步地將西法安頓於中國的傳統之內。

然而，在邱熺將西洋種痘法融入中國在地的醫學與文化之前，他的同鄉黃安懷已公開宣揚類似的觀點。嘉慶二十年，黃安懷撰《西洋種痘論》，指出：

嘉慶十年，啖咕喇載痘種並其國醫咕拿，自呂宋航海至粵，為人種痘。¹⁸⁰……百發百中，永不出痘云云。但查伊書祇圖繪種法，而未確指出其源，故於初種之時，人見其與吹鼻法異，多疑以為怪，而不知殊非怪也，彼鬼子特未發明其所以然耳。夫西洋之法亦猶之乎吹鼻之法耳，而巧則過之。何也？吹鼻之法由肺引入，挑臂之法亦由肺引入，但吹鼻則觸動五臟六腑之火，故出痘或多。挑臂則於兩臂之中，獨取夾白微微動處之穴，剔起漿漿，經絡皮毛具屬於肺，而夾白一穴又兼入於心，《內經》云：「諸痛癢癢俱屬於心」，痘為先天邪火，伏之於心，彼巧莫巧於單刀直入，獨提出先天一點心火，而餘經不動，此所以獨出一顆，而奏萬全之效也。¹⁸¹

爲了去除人們對西洋種痘術的疑慮，黃安懷爲「鬼子」的西法「發明其所以然」，以傳統醫學重新詮釋西法的原理，他不但徵引《內經》的理論，繼續發揮明清以來痘邪屬心火的學說，同時藉此提出夾白穴屬於肺而兼入心之說，指出西洋新法獨出一顆的機巧所在，並透過比較鼻苗法與西洋新法，彰顯西法的萬全與巧妙。

¹⁸⁰ 當時來粵為人種痘的英國醫生是皮爾遜，黃安懷誤植為種痘發明人咕拿。

¹⁸¹ 清·黃安懷，《西洋種痘論》（廣東省城學院衙門前聚賢堂藏板，收入邱熺，《西洋痘書》），頁9-10。根據「但查伊書祇圖繪種法」之語，黃安懷應可能讀過《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而以在地化觀點重新詮釋西法。

爲了進一步與吹鼻法相比擬，黃安懷稱西法爲「挑臂法」，強調兩者接種技術的不同，並說明運針之法：

當種之時，須按正兩臂中間微微動處，即係夾白之穴，用筆墨點定，然後輕輕用手斜針挑起纖纖薄皮，不可挑破肉上之膜，至令血出，則是皮毛之下，血肉之上，中隔一膜，《內經》所謂分肉者此也。若不從微微動處點定，下針偏左偏右，稍遠夾白之穴，則獨不能提出先天心火，而痘不出，即出，後亦復發，此非種法之差也，特其下手種痘時之謬也。¹⁸²

黃安懷認爲人們傳言與擔心之西法種後復出的原因，是未能找到正確穴位所致。對黃氏來說，西法本身並無可議，接種技術才是成敗的關鍵。

黃安懷以《內經》與傳統痘科醫學爲基礎，將西洋種痘新法理論化與在地化的作法，實與邱熺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兩人取徑雖然一致，但所選擇的經脈理論卻各有千秋。黃氏取用肺經與心經，獨取手太陰肺經之夾（俠）白穴；邱氏則直指三焦經，選用手少陽三焦經之消燄與清冷淵二穴。黃安懷的夾白穴說，相對於《引痘略》而言，更近乎《嘆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的種法，亦即只在手臂上種痘一顆，與邱熺獨接種四至六顆之見有別。但在另一方面，夾白穴位於上臂的內側，而消燄與清冷淵穴則位於上臂外側，均與《嘆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接種部位圖式所示之部位不同，顯示黃、邱二人乃是各以他們的在地目光與角度爲西洋種痘法在中國定位。

黃安懷《西洋種痘論》還提出「有力之家各捐菓金，以留其種」的建議，此一呼籲後來被邱熺所供職的洋行公所實踐。再者，黃安懷也運用五行觀念，解釋西法能解痘毒的機制：

其用西牛之痘種者何？以牛性屬土，毒逢土則解，借牛之土性以解痘之火毒耳。¹⁸³

縱然黃安懷與邱熺的詮釋不盡相同，¹⁸⁴ 但二人從在地的、本位的角度，理解與重塑西洋種痘新法則是如出一轍。

¹⁸² 《西洋種痘論》，頁9-10。

¹⁸³ 同前書，頁10。

¹⁸⁴ 雖然黃安懷在完成《西洋種痘論》後十年左右，「聞知浩川翁獨擅其傳，……亟命小孫乞為點種，隨手奏效」，遂書寫七截贈與邱氏，被邱氏收錄在《引痘題詠》中，但黃氏仍堅持西法「獨取夾白一穴」，「單提出先天心火」之見；見《引痘題詠》卷上，頁6。

從時間的先後來看，黃安懷以在地的眼光與思維觀看與詮釋西洋種痘法，實早於邱熺。但是，由於《引痘略》遠較《西洋種痘論》盛行，黃安懷其人、其文及其看待牛痘的在地觀點遂較不為人所知，反倒是時間晚出的邱熺相對地享有盛名，且被視為將牛痘在地化與中國化的表率。即使如此，道光十五年（1835）廩生譚瑩撰寫的《南海縣志·雜錄》卻記載了《西洋種痘論》獨選夾白穴接種之法：

牛痘之方，嘆咭喇蕃商哆咭咬於嘉慶十年攜至粵東。其法：刺牛膊上小痘，剔取漿水，點小兒兩膊之夾白穴，痘即如期從穴出。¹⁸⁵

黃安懷的觀點被地方志所採納，可見其說在南海境內仍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與地位。

黃安懷與邱熺將西洋新法與中國傳統結合的策略，都是針對當時兩廣地區的環境與現況而發，以消除人們對新法的憂慮或曲解。《西洋種痘論》與《引痘略》出版時，西法雖已傳入中國十年，但因鼻苗法在江南推行已久，縱使曾出現若干失敗的案例，一般人多信任之，對這些人來說，毋須冒險嘗試新法，再加上新法種後復出的傳言時有耳聞，令人生畏，於是正如《南海縣志·雜錄》記載的：「粵人未大信，其種遂失傳」，¹⁸⁶使新法的推展受到阻礙。此一「人未之信」的事實，¹⁸⁷或即此後推廣新法者不斷將新舊二法相提並論的主因。¹⁸⁸

西洋種法入粵初期引發疑慮，可從周純熙《洋痘質疑》（1827）窺其一斑：

夫洋痘與鼻苗痘所爭，不過氣血之分耳，世人必謂洋痘假，而鼻苗痘真，何也？豈以鼻苗從鼻入，屬氣分者為真，洋痘從臂入屬血分為假乎？不知氣與血二者，本相流通，人藉氣以生，未有不資血以活，血如不行，氣能獨運乎？何洋痘一術，風聞者往往從而疑之？謂遲至十年或二十年，必然復出？夫同一痘也，鼻苗引先天之氣，洋痘獨非引先天之毒乎？既同引先天之毒，又焉有真假之別乎？今持是說以與天下爭，而信者十之一，不信者十之九，此亦囿於一隅之見耳。……且夫洋痘之與鼻苗痘，其難易緩急

¹⁸⁵ 清·譚瑩，〈雜錄〉，收入《南海縣志》（道光十五年），卷四四，頁30。譚氏此段係根據《常惺惺齋詩註》與《採訪冊》二書寫成。

¹⁸⁶ 同前書，卷四四，〈雜錄二〉，頁30。

¹⁸⁷ 在一八五〇年合信氏醫師提出的報告中，仍有部分廣東人士對西洋種痘法存有偏見；Benjamin Hobson, *General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Kum-le-fau in Canton, From April 1848, to November 1849* (Canton: Press of S. Wells Williams, 1850), p. 32.

¹⁸⁸ 除此之外，十九世紀，形成西洋種痘新法與鼻苗種法之爭局面的原因還有很多，相關之討論；參見范行準，《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頁143-147；梁其姿，〈明清預防天花措施之演變〉，頁251-252。

固有間矣，與其種鼻苗而有周迴五臟之難，孰若種洋痘而使直達命門之易，與其鼻苗一種，而使嬰兒身弱體困，發而為大熱、為咳嗽、為口渴，痘多者或至倉皇失措，如此其急，孰若洋痘一種，而令嬰兒嘻笑自如，飲食無恙，如此其緩，是其孰利孰害，不待智者而知也。世人不察，咸謂洋痘之無濟，獨不聞粵省洋行開局放痘，不取毫利，孰非為小兒造普渡慈航乎！¹⁸⁹

周純熙採用與黃安懷、邱熺相同的策略，消除人們對新法的疑懼。周氏假借傳統醫學的概念，把洋痘與鼻苗痘之「所爭」，化約為「氣血之分」，指出兩者均能引出先天胎毒，無所謂真假之分，只是洋痘比鼻苗痘更能迅速直達命門，¹⁹⁰且接種者可嘻笑自如，正常飲食。此外，周氏還不忘宣傳洋行免費接種之善舉，鼓勵人們種痘。

黃安懷、邱熺與周純熙先後為西洋種法在傳統醫學與思想中尋溯根源，非僅單純宣揚西法與解開一般人的疑竇而已，還有更重要的目的，誠如黃安懷所云：

但查伊書祇圖繪種法，而未確指出其源，故於初種之時，人見其與吹鼻法異，多疑以為恠，而不知殊非恠也，彼鬼子特未發明其所以然耳。¹⁹¹

皮爾遜的著作以介紹西法的技術為主，未說明原理而引發疑慮，黃安懷與邱熺則並重理論與技術，摭採傳統醫療、思想與文化，將西法理論化與在地化，以進一步說服菁英階層，突破當時「人未之信」的窘境，這一點正是《嘆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與《西洋種痘論》、《引痘略》最大的差異，更是西法在《西洋種痘論》與《引痘略》出版之後能邁入新里程碑的關鍵。

嘉慶二十二年，在「人未之信」的環境下，溫汝适為《引痘略》撰寫序言：¹⁹²

余觀《本草綱目》，見其稀痘方用白牛蝨，以此蝨僕緣牛身，食飽自墜，用之能稀痘，即取其中有牛血耳。牛蝨尚能稀痘，則牛痘必稀，用其苗以

¹⁸⁹ 清·周純熙，《洋痘質疑》（收入邱熺，《西洋痘書》），頁1-4。

¹⁹⁰ 近年來關於命門的研究，請參見張嘉鳳，〈生化之源與立命之門——金元明醫學中的命門試探〉，《新史學》9.3 (1998)：1-48。

¹⁹¹ 《西洋種痘論》，頁9-10。

¹⁹² 溫汝适字步容，號箕坡，廣東順德龍山人。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進士，改庶常授編修，嘉慶二年（1797）入直尚書房，嘉慶十八年（1813）擢為兵部右侍郎，著有《曲江集攷證》、《曲江年譜》、《攜雪齋詩鈔》與《文鈔》等。此外，尚有未出版之著作，包括《咫聞錄》二卷、《韻學紀聞》二卷、《日下紀游略》二卷藏於家；參見《廣東通志》卷二八七，〈列傳〉，頁4966。

種，宜獲十全之效，理有固然，無足怪者。是中國人已發其端，而外洋人專心致志，觸類引伸，亦其一長也。¹⁹³

官至兵部右侍郎的溫汝适之觀點，其實是清朝自中西交流以來，常見的「西學中源」假說之一端，這段文字後來亦收入《廣東通志》、《（重脩）番禺縣志》和《光緒廣州府志》裡，¹⁹⁴ 可見溫氏之說頗具代表性。

與溫汝适不同的是，黃安懷、邱燦與周純熙認為「西洋種痘」、「牛痘」或「洋痘」與中國鼻苗法的來源與種法不同，但他們彼此之間並無繼承關係，而是同出一系，均能引出先天胎毒，只是西法更簡捷而安全。三人與溫汝适不同的觀點，顯示十九世紀上半葉中國人面對西洋技術時，即使在同一陣營之中，存在著多元的觀點和態度。

自西洋種痘法傳華以來，人們對於「中國化（華夏化）」、「在地化」的觀點並非毫無自覺，邱燦《引痘題詠》可以為證。在《引痘題詠》題贈詩文者，都是西洋新法的受惠者或其親友，他們多為官吏或鄉紳，具有相當的社會地位與影響力，他們稱新法為「夷法」、「夷術」或「虜法」，來自「島夷」、「粵夷」、「夷醫」或「夷人」，此法傳到邱燦之手，遂「變夷原用夏」、「用夷變於夏」，¹⁹⁵ 這些贈詞者深知邱燦為西洋新法改頭換面的作法和用心，並樂於接受邱氏的新說且宣揚之。從他們集體為西洋新法與邱燦新說的見證與背書，正可看出在地化與理論化之後的新法的傳播力道。

道光八年，曾望顏重刻《引痘略》，補入〈翻譯啖咭喇夷醫種牛痘原序〉，但這篇文字並不見於嘉慶二十二年初刊的《引痘略》。曾望顏補入「夷醫原說」的目的，是要「以存其始」，則〈翻譯啖咭喇夷醫種牛痘原序〉很可能是《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的另本翻譯或節譯本，但細觀兩者的內容卻又不完全相同，亦不無後人修訂與增刪的可能。¹⁹⁶

〈翻譯啖咭喇夷醫種牛痘原序〉內文分成兩個部分，¹⁹⁷ 第一部分簡述西洋

¹⁹³ 溫汝适，〈序〉，收入《引痘略》（道光七年），頁402。

¹⁹⁴ 《廣東通志》卷三三一，〈雜錄一〉，頁5684；《（重脩）番禺縣志》卷五四，〈雜錄二〉，頁22；《光緒廣州府志》卷一六三，〈雜錄四〉，頁41。

¹⁹⁵ 《引痘題詠》卷上，頁6, 8, 12；卷下，頁3, 10, 11, 12, 23, 31, 34。

¹⁹⁶ 〈翻譯啖咭喇夷醫種牛痘原序〉內容第二部分，有列出五條細目之版本，也有七條者，從這一點即可看出後人確有刪潤此文的可能。

¹⁹⁷ 後來重刻的《引痘略》或輯錄《引痘略》的相關著作中，又有只保存第一部分，而略去第二部分的情形。

種痘法發明的經過，與嘉慶十年四月從小呂宋傳入澳門的事略，基本上是《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的節譯版，但比邱燊《引痘略·引痘說》詳細得多。〈翻譯啖咭喇夷醫種牛痘原序〉第二部分的體例猶如一般書籍之凡例，細分成五個條目，¹⁹⁸ 分別說明牛痘種與天行正痘不同、牛痘接種部位、使用的刀具、乾苗法、種後不出的原因與補種。此一順序，與《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的排序一致，但種痘不出的原因與補種一項，不見於《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而《引痘略》卻針對此項做詳細的說明和舉例。若將其餘四項的內容與《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比對，除了牛痘接種部位一項有較明顯的差異之外，其餘三項內容大致相似，惟《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有乾苗法之實，但尚無乾苗法之名。再者，除了牛痘接種部位與刀具以外，〈翻譯啖咭喇夷醫種牛痘原序〉第二部分的其餘三條都見於《引痘略》，且說明更為細緻。在這五項之中，《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與《引痘略》對於刀具的敘述，均較〈翻譯啖咭喇夷醫種牛痘原序〉為少。根據上述，〈翻譯啖咭喇夷醫種牛痘原序〉與《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引痘略》兩書之間，存在著相互關連的有趣關係。

《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與〈翻譯啖咭喇夷醫種牛痘原序〉、《引痘略》的關係，以〈翻譯啖咭喇夷醫種牛痘原序〉述及牛痘接種部位為例：

種之部位在肩膊之下，曲肘之上，臂背多肉之處，近曲肘約寸餘，或二寸許，視兒之大小為度，兩手並種，每邊兩顆，多不過三顆，勻排臂上，相去約四五分。¹⁹⁹

《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只說「將外科小刀向相近肩膊臂上，不拘左右手，平刺皮膜」，種下一顆即完成種痘手續，〈翻譯啖咭喇夷醫種牛痘原序〉則較為繁複。再與《引痘略》相較，〈翻譯啖咭喇夷醫種牛痘原序〉既未點出消燦與清冷淵的穴名或穴位，也嗅不出傳統醫學與文化的氣味，但卻已逐漸脫離《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單點接種的原型，改在雙臂各種二到三顆，與《引痘略》所種數目一致。如此一來，〈翻譯啖咭喇夷醫種牛痘原序〉或可視為介於《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與《引痘略》中間的過渡文本。相對於《引痘略》來說，〈翻譯啖咭喇夷醫種牛痘原序〉保存較多《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的原意與精神，而

¹⁹⁸ 第二部分又有分做七條者，其所多出的兩條分別是「種法」與「種後發點」，但僅存條目，不見內容，且其下均有按語「詳邱氏《引痘略》」，因此列出五條與七條者之版本間差異甚微。

¹⁹⁹ 〈翻譯啖咭喇夷醫種牛痘原序〉，收入《引痘條約合梓》，頁7。

《引痘略》有關牛痘的理論與技術，乃是在《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與〈翻譯啖咭喇夷醫種牛痘原序〉的基礎上，進一步演繹發明而來。

邱熺既然是中國第一批西洋新出種痘法的受惠者，也是直接向皮爾遜學習新法的先驅之一，極可能讀過公開發行的《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但奇怪的是，《引痘略》對此卻隻字不提。事實上《引痘略》經常可見《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的影子，首先，從圖式來看，《引痘略》的「種痘刀式」與「取痘漿象牙小簪式」，無論就畫法或文字說明方面，都與《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的「象牙小簪」和「外科小刀」極其相似（參見圖二與圖三）。其次，從內容來看，《引痘略》第一節〈引痘說〉有關牛痘源流的敘述，實為《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前半部的濃縮。第三，從技術層面來看，《引痘略》敘述取苗、刺種方法，以及辨別真痘、假痘的原則與內容，均與《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所言大同小異。第四，《引痘略·度苗法》介紹遠處難以取得鮮漿時，得以「乾苗法」替之，與《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記載的替代方案如出一轍。根據以上的比對，很難讓人相信邱熺未曾親見《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

雖然邱熺試圖抹去他與皮爾遜以及《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之間的密切關係，但道光八年曾望顏重刊《引痘略》，卻「并弁繙譯夷醫原說於前，以存其始，合而刻之，遍告於世」。²⁰⁰ 正因為如此，吾人才能從〈翻譯啖咭喇夷醫種牛痘原序〉中，一窺《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與《引痘略》的淵源。即使《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發行或不如《引痘略》廣遠，但並不表示人們對此書一無所知，道光九年（1829），正在銀川任官的趙宜暄為重刊的《引痘略》寫序，提到他的友人寄來一部《引痘略》，為了進一步求證，趙宜暄特地將邱氏之書「證諸《啖咭喇種痘書》」，發現兩書內容「皆吻合」，²⁰¹ 趙宜暄顯然先藏有一部《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且視之為正統西法。值得注意的是，趙氏指證兩書內容吻合之實，實即暗指《引痘略》源於《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

道光十五年（1836）編纂的《南海縣志》指出，協助翻譯與發行《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的鄭崇謙因「後嗣式微」，「遂有竊其書而增益之以問世者，不復舉崇謙名氏也，良可慨矣」，²⁰² 這一番話對照趙宜暄的發現，所謂的竊書者

²⁰⁰ 清·曾望顏，〈序〉，收入《引痘略》（道光二十八年），頁4。

²⁰¹ 清·趙宜暄，〈重刊《引痘略》序〉，收入清·邱熺，《引痘略》（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道光九年〔1829〕重鐫）。

²⁰² 《南海縣志》（道光十五年），卷二五，〈藝文略〉，頁55。

指的應是《引痘略》作者邱熿。邱熿絕口不提皮爾遜及其著作的原因，除了可能是刻意避開與破產獲罪的鄭崇謙之牽扯以外，若再細讀《引痘略》與《引痘題詠》，不難發現邱氏反覆自詡為傳種牛痘的第一人，從此一性格特點來看，即可理解何以邱熿在演繹皮爾遜原書之餘卻無心追述師承。再者，與《嘆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相比，邱熿特別強調種痘師看痘與種痘的專業知識與重要性，²⁰³ 亦可隱約看出邱熿的個性。於是，當邱熿在刻意誇耀自己的功績時，不免無意溯及既往，或披露他與皮爾遜、鄭崇謙之間的淵源。

《光緒廣州府志》記述廣東洋行商人籌建痘局之沿革時，指出：

嘉慶辛未（1811），……洋商潘有度、²⁰⁴ 盧觀恆兩都轉、²⁰⁵ 伍秉鑑方伯²⁰⁶ 共捐銀三千兩，發商生息，以垂永久。募習者，得番禺梁輝、香山張堯、南海邱熿、譚國四人，其後梁返黃埔，張歸翠微，邱、譚兩人遂擅其技。……至道光壬寅（1842），經費為當事者虧折，伍方伯崇耀遂獨力支柱者十年。²⁰⁷ 至同治壬戌（1862），制府勞文毅公崇光札諭惠濟義倉歲撥銀約百五十兩，仍俾當事者後人分董之，以永其傳。²⁰⁸

²⁰³ 例如邱熿主張小兒種痘灌漿之後，「必須請原種痘之人看過，方保無誤」；見《引痘略》（道光七年），頁411。

²⁰⁴ 潘有度（1755-1820）又名致祥，字憲辰，號容谷，原籍福建同安，寄籍廣東番禺。一七八八年，潘有度接掌其父潘啟（振承，1714-1788）的事業，經營同文行，在十八世紀八〇至九〇年代間，是與英國東印度公司交易額最大的行商，一七九六年，潘氏成為洋商首名商人；參見陳國棟，〈潘有度（潘啟官二世）——一位成功的洋行商人〉，唐文雅主編，《廣州十三行滄桑》，頁150-193。

²⁰⁵ 盧觀恆（1746-1812），字熙茂，新會縣棠下鎮石頭村蓬萊里人，以茂官（Mowqua I）為商名，經營廣利行；見黃啟臣、龐新平，《明清廣東商人》（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2001），頁287-300。

²⁰⁶ 伍敦元（1765-1843），又名伍秉鑑，以浩官（Howqua）為商名，料理怡和行行務最久；見林子昇，《十六至十八世紀澳門與中國之關係》（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頁227-230。

²⁰⁷ 伍紹榮，原名元薇，後改名崇耀，字紫垣，道光十三年（1833）起接掌怡和洋行。一八四〇與五〇年代，怡和洋行在印度鴉片的出口額份，通常佔總額的三分之二，來自鴉片的利潤，使怡和洋行在印度出口貿易與中國進口貿易的代理人與商人之中，居於領先的地位，一八六〇至七二年間，怡和洋行每年經營鴉片的數量更為龐大；見勒費窩（Edward Le Fevour）著，陳曾年、樂嘉書譯，《怡和洋行：1842-1895年在華活動概述》（1970，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頁2, 6, 15。由於伍氏在洋商之間地位與財力最為雄厚，故能在鴉片戰爭之後獨立資助痘局。再者，對於直接造成「阿芙蓉毒流中國」的鴉片貿易商伍氏家族來說，支助與推廣牛痘，至少能「稍將兒壽補人年」。

²⁰⁸ 《光緒廣州府志》卷一六三，〈雜錄四〉，頁40。

對照邱熺長子邱昶的敘述，同治元年（1862），「督憲勞辛階大人面與伍紫垣方伯商酌，並仰合省縉紳將洋行重設痘局，撥歸惠濟義倉經理，仍邀昶在局董其事」，²⁰⁹ 則《光緒廣州府志》所說虧折經費的「當事者」就是邱熺，可知邱熺除了涉及「抄襲」疑雲之外，還曾捲入金錢醜聞。雖然邱氏傳種牛痘有功，但是他個人品行或有缺陷，此或廣東各地方志不為他單獨立傳的原因之一。

邱熺雖或有好大喜功之性格，但亦有敬謹戒慎的一面；雖或不慎淌入弊案的泥淖，其慈幼濟世的善舉卻也不容一筆抹煞。《引痘略》在採擷《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之餘，既有因襲和演繹之處，也有為了適應中國當地需求而獨創的面向，以及取自邱氏本人的種痘經驗。後者往往展現在種痘技術等細節上，譬如種苗之際，邱氏主張須以小繩將孩童手膊束緊，並令孩童穿著柔軟絲絨；又恐射利之徒「自作聰明，竟將天行痘漿與人刺引，及遇發時渾身俱出」，²¹⁰ 邱熺勸誡病家必須謹慎，若不幸遇此，則須延醫診視。

與《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對照，《引痘略》所創的新說之中，最令人矚目的是，摭採傳統五行與氣論的思想，替啖咕喇新出種痘法在中國「正名」，並藉由傳統醫學將西洋新法理論化，同時還採借和挪用當代所熟悉的鼻苗種法之形式與語言，徹底將此一西洋傳入的技術在地化，為西法在華的推廣定下充滿傳統風味的基調。十九世紀，隨著越來越多的官吏、仕紳、商賈與種痘師之積極投入，牛痘傳播日廣，尤其是在江南地區，雖然新法不可避免地遭遇若干困境，且缺乏政府的全面支持，但牛痘的支持者仍不斷以「在地化」與「西學中源」雙重策略作為主要的宣傳手段，他們的論述根源殆多始於《引痘略》。至此，與西洋種痘法在中國的傳播相比，邱熺個人的負面評價，相對地微不足道了。

四・結論

一八〇五年，英國種痘法成功登陸澳門，為中國的天花防治開啓嶄新的一頁，當時諸多在澳門從事新法接種的外籍醫生之中，以英國皮爾遜醫師最廣為人知，甚至被視為傳入西法的第一人，這都是拜其著作《啖咕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譯成中文，並在中國流通之賜。相對於皮爾遜，中國痘師邱熺的知名度更高，遠

²⁰⁹ 邱昶，〈補序〉，收入《繪圖引痘心法全書》（埭葉山房校刻本），頁又7。

²¹⁰ 《引痘略》（道光七年），頁412。

超過鄭崇謙、梁輝、張堯與譚國等人，亦須歸功於流傳廣遠的《引痘略》。相反的，黃安懷《西洋種痘論》有限的出版與發行量，使其人與其書幾遭後人遺忘。因此，在十九世紀中國牛痘史上，人物的聲名與評價，顯然與文本的撰寫與流傳情況關係至重，而本文的討論正彰顯了此一實況與特點。

文本兼具傳播新知與學習教育的功能，十九世紀初出版的《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西洋種痘論》與《引痘略》正是為此而作，其中尤以《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和《引痘略》最具代表性。隨著這兩部書在各地的傳布與再版，西洋種痘術逐漸在華打開市場，與鼻苗種法分庭抗禮，最後甚至凌駕其上，在二十世紀擔負起撲滅天花的重責大任，影響深遠。在這個漫長而曲折的歷史過程中，上述文本不僅是傳播西洋種痘知識、原理與技術最重要的功臣之一，也是為中西醫學技術與文化交流搭建橋樑的先驅。

文本的內容可能引導，也可能誤導我們一窺歷史的真相。邱熺《引痘略》刻意掩飾他個人與皮爾遜的師徒情誼，以及《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與《引痘略》之間的繼承關係，即是例證。此一作法雖或有難言之隱，卻表現出邱氏自詡首功的企圖與亟欲求名的性格。然而，《引痘略》自創的巧思，及其四十餘年為人種痘的功績，不容忽略。

文本可能隱含弦外之音，寓意深遠，若同時交錯比較多種文本，則可聆聽各種聲音的本位立場。《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在推廣西洋新法以博取中國人好感之餘，亦間接地呈現西法及其技術、文化的優越性。《西洋種痘論》與《引痘略》固然公開承認與讚揚西法的快捷有效，但當黃安懷與邱熺不約而同的以在地眼光審視西法之際，卻赫然發現西法「未確指出其源」，略遜一籌。於是在這一場中西技術與文化的比較、交流、角力之中，黃邱二人巧妙地運用中國在地的醫學與文化觀點彌補騎縫，試圖消除雙方的隔閡，突破「人未之信」的困境，結果使得「啖咭喇國新出種痘法」搖身一變，成為「以土引土，同氣相感」，且與傳統鼻苗法系出同門的「牛痘」，牛痘的傳播從此邁入新紀元，獲得更多人的響應與支持。中國在地化觀點的提出與持續發揮，是影響西洋種痘新法傳華之後發展與變化的關鍵。

同樣是在地觀點，但《西洋種痘論》與《引痘略》卻選擇不同的經典依據與接種穴位；一樣是牛痘的支持者，溫汝适強調西學中源說，而黃安懷、邱熺與周純熙則主張西洋痘法與古鼻苗法殊途同歸。同一陣營中人的細微差異，更能展現十九世紀中國人面對西學的多元態度。

十九世紀初年，牛痘歷經波折才在中國站穩腳步。吳鯨〈洋痘可信說〉指出「余謂馬伏波以苗蠻之痘入中國災小兒，今嘆咭喇以鬼子之法入中國救小兒，皆天道自然之理，無足怪者」，²¹¹ 這種訴諸天道與自然的論點，雖然讓若干中國人理直氣壯地接受牛痘，但看在當時肯定牛痘的兩廣總督阮元眼裡卻是：

阿芙蓉毒流中國，力禁猶愁禁未全，若把此丹傳各省，稍將兒壽補人年。²¹²
阮元憂慮鴉片為禍更深，恐非小兒種痘增壽所能彌補。據此，牛痘接種技術在歷史的洪流中，終究不過是「小道」而已！

（本文於民國九十六年四月十九日通過刊登）

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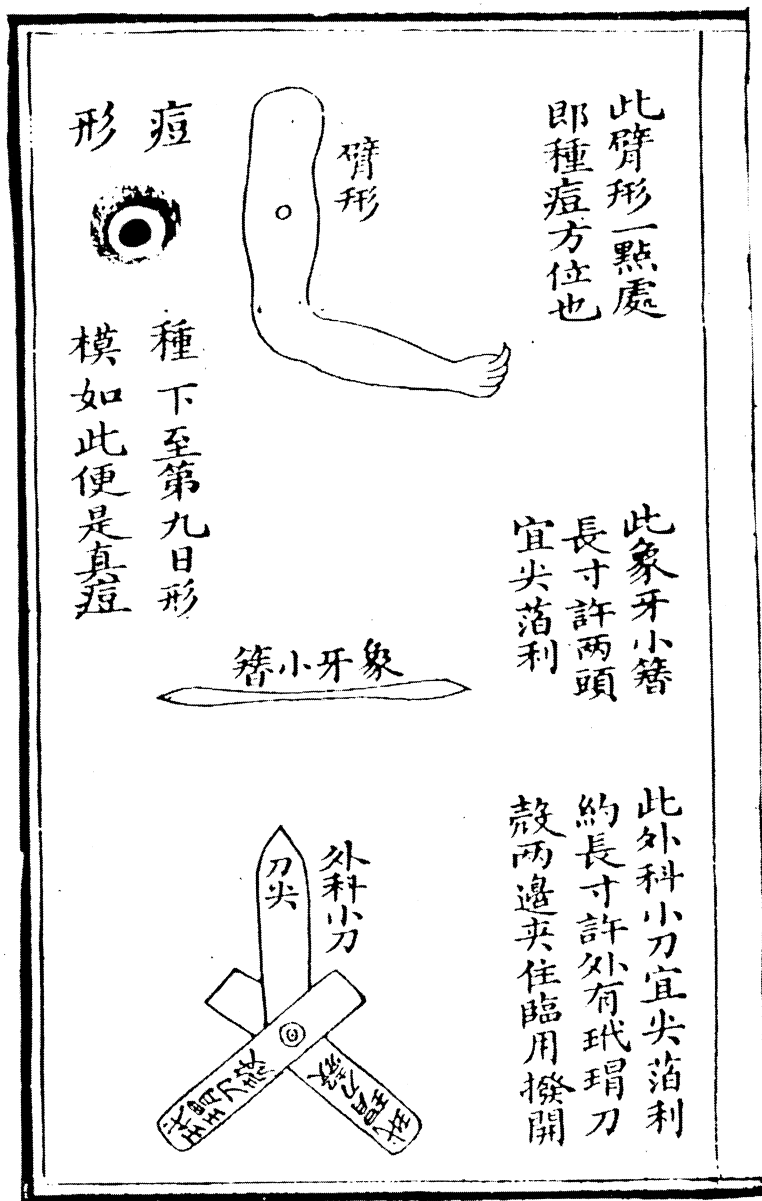
感謝梁其姿、韓琦、周維強、董少新、孫承晟、衣若蘭、張秀蓉、陳慧宏、周伯戡、崔嘉珊等學界先進與兩位審查人提供資料或建議，本文是國科會專題計畫 (NSC93-2411-H-002-038) 的成果之一。

²¹¹ 清·吳鯨，〈洋痘可信說〉，收入《引種牛痘方書》(1855)，頁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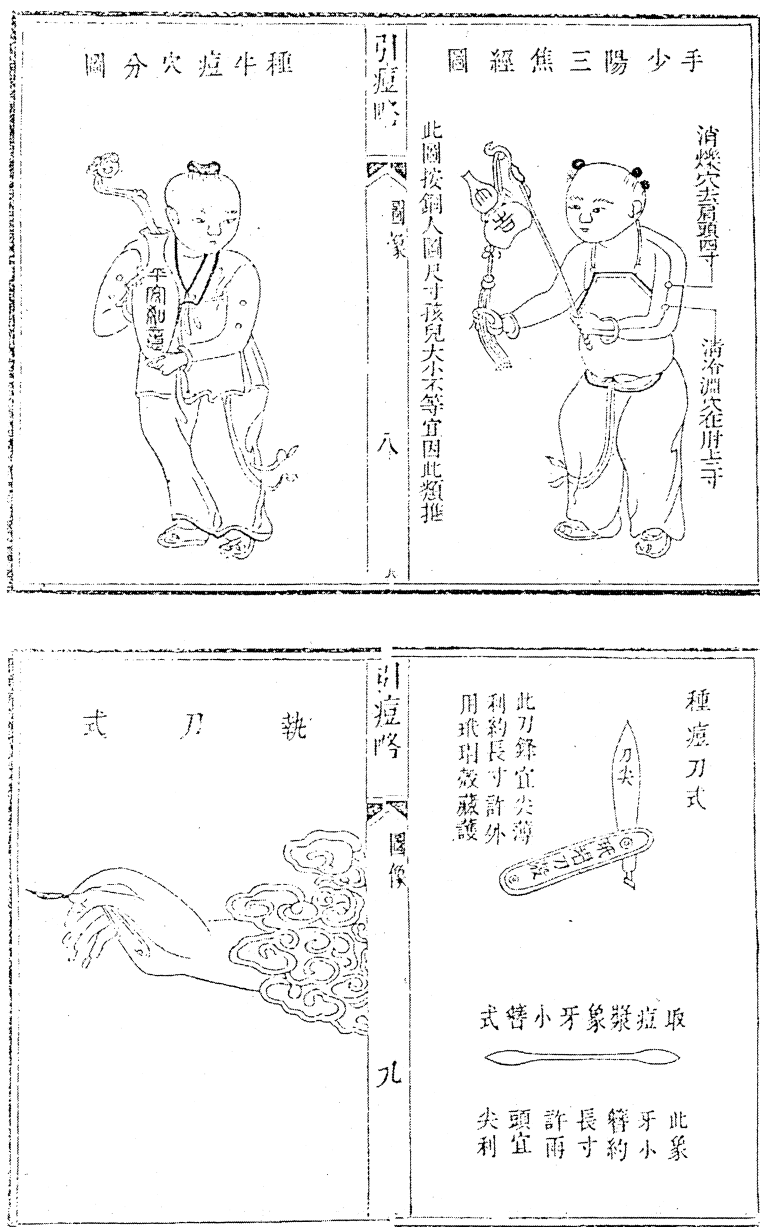
²¹² 《引痘題詠》卷上，頁2。



圖一 《嘆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與《引痘題詠》



圖二 《嘆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圖式（亞非學院藏本）



圖三 《引痘略》圖式（道光七年）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王惇甫（新吾）輯要，戴昌祚重訂，《引種牛痘新書》(1863)，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金聲堂藏本，光緒十四年（1888）京江劉氏重刊。
- 王新吾重輯，《牛痘新書》，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光緒三年（1877）嚴州府重刊本。
- 朱純嘏，《痘疹定論》(1713)，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乾隆三十二年（1767）味經堂重刊本。
- 吳寧瀾，《保嬰易知錄》(1812)，收入曹炳章編，《中國醫學大成績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第39冊。
- 吳鯁，〈洋痘可信說〉，收入劉堃重刊，《引種牛痘方書》，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咸豐五年（1855）孟夏月重刊，板存江西省甲戌坊藜照堂刻字店。
- 吳謙等編纂，《醫宗金鑑》(1742)，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8。
- 李福泰修，史澄、何若瑤等纂，《（重脩）番禺縣志》，Cambridge, MA: Harvard-Yenching Library（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同治十年（1871）光霽堂刊本。
- 阮元等纂，《廣東通志》(1822)，臺北：臺灣書店，1959。
- 沈善豐，《牛痘新編》(1885)，上海：上海圖書館藏。
- 孟河（介石），《幼科直言》(1726)，臺北：旋風出版社，1973。
- 周純熙，《洋痘質疑》，收入邱燾，《西洋痘書》，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嘉慶二十年（1815）鐫，道光元年（1821）又鐫，道光七年（1827）重刊，版藏廣東省城雙門底書坊味經堂並發兌，南海林述之刊送，宜章周純熙刷送一千部，頁1-4。
- 邱燾，《引痘略·引痘題詠附刻》，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嘉慶二十二年（1817）雙門底書坊敬業堂發兌，百蘭堂藏本。
- 邱燾，《引痘略》，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子部，醫家類，第1012冊，道光七年（1827）奎光齋刻本，頁399-417。
- 邱燾，《引痘略》，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道光九年（1829）重鐫。
- 邱燾，《引痘略》，上海：上海圖書館藏道光二十八年（1848）客花草堂刻本。
- 邱燾，《引痘略合編》，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同治十一年（1872）渝城都郵街文古堂刻本。

- 邱燐，《引痘略合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道光二十七年（1847）督察院左都御史文慶題字本。
- 邱燐，《引痘新法全書》，北京：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藏道光十四年（1834）重鑄，經國堂藏本。
- 邱燐，《引痘新法全書》，北京：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圖書館藏咸豐二年（1852）致和堂重鑄。
- 邱燐，《引痘題詠》，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道光三年（1823）本。
- 邱燐，《引痘新書》，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藏本立堂重鑄本（1874）。
- 邱燐，《引種牛痘方書》，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光緒二十年（1894）江西書局刻本。
- 邱燐，《西洋痘書》，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嘉慶二十年（1815）鑄，道光元年（1821）又鑄，道光七年（1827）重刊，版藏廣東省城雙門底書坊味經堂並發兌，南海林述之刊送，宜章周純熙刷送一千部。
- 邱燐，《西洋點痘論》，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道光八年（1828）刻本。
- 邱燐，《繪圖引痘心法全書》，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光緒八年（1882）埽葉山房校刻本。
- 邱燐，《繪圖引痘心法全書》，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光緒八年（1882）校經山房校刻本。
- 邱燐原著，仁靜山校刊，李汝霖補輯，《引痘秘書》，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光緒二年（1876）皖省痘局藏本。
- 查道倫，《引痘集要》（1869），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
- 哆琳咬編輯，皮爾遜審訂，嘶噹唛譯，鄭崇謙書，《啖咕唛國新出種痘奇書》，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圖書館藏。
- 哆琳咬編輯，皮爾遜審訂，嘶噹唛譯，鄭崇謙書，《啖咕唛國新出種痘奇書》，英國大英圖書館（The British Library）藏。
- 哆琳咬編輯，皮爾遜審訂，嘶噹唛譯，鄭崇謙書，《啖咕唛國新出種痘奇書》，英國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圖書館藏一八五八年重刊本。
- 哆琳咬編輯，皮爾遜審訂，嘶噹唛譯，鄭崇謙書，《啖咕唛國新出種痘奇書》，美國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圖書館藏。
- 哆琳咬編輯，皮爾遜審訂，嘶噹唛譯，鄭崇謙書，《啖咕唛國新出種痘奇書》，英國衛爾康圖書館（The Wellcome Library）藏。
- 徐忭忭編輯，三農老人註釋，《增訂婦嬰至寶》，北京：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圖書館藏道光二十四年（1844）鑄，版藏蘭州浙江會館。

- 寄廬主人編，《臍風牛痘要言數則》，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光緒十八年（1892）鐫。
- 張介賓，《景岳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6。
- 張崇樹，《引痘略續篇》，收入邱燐，《引痘略合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道光二十七年（1847）督察院左都御史文慶題字本。
- 張琰，《種痘新書》（1741），收入《新輯中西痘科全書》，臺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77。
- 陳賢榮編，《重刊邱趙牛痘書》，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光緒十二年（1886）浙寧西門鋤經齋鐫。
- 滋德堂施種牛痘局，《引痘條約合梓》，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同治十三年（1874）鐫。
- 程雲鵬（鳳雛），《慈幼新書》（1644），臺北：旋風出版社，1973。
- 賀縉紳編，《平江賀氏彙刻醫書》，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光緒四年（1878）刻本。
- 馮兆張，《馮氏錦囊秘錄·痘疹全集》（1694），臺北：五洲出版社，1987。
- 黃安懷，《西洋種痘論》，廣東省城學院衙門前聚賢堂藏板，收入邱燐，《西洋痘書》，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嘉慶二十年（1815）鐫，道光元年（1821）又鐫，道光七年（1827）重刊，版藏廣東省城雙門底書坊味經堂並發兌，南海林述之刊送，宜章周純熙刷送一千部，頁6-11。
- 毓蘭居士輯，《種痘要法》，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道光二十三年（1843）萬卷堂鐫。
- 萬全，《萬密齋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7。
- 潘尚楫等修，鄧士憲等纂，《南海縣志》，Cambridge, MA: Harvard-Yenching Library（哈佛燕京圖書館）藏道光十五年（1835）修，同治八年（1869）重刊。
- 鄭榮等纂，《南海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宣統二年（1910）刊本影印，1974。
- 戴肇辰、蘇佩訓修，史澄、李光廷纂，《光緒廣州府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據清光緒五年（1879）刻本影印，2003。
- 小山肆成校，《引痘新法全書》，大阪：杏雨書屋藏天保十三年（1842）翻刻，平安東風館藏本。
- 伊藤圭介（錦窠）校刻，《啖咭喇國種痘奇書》，大阪：杏雨書屋藏花繞書屋藏本（1841），昭和十二年（1937）小西膽寫堂覆刻，吉川芳秋編輯暨發行。
- 桑田立齋編輯，《引痘要略解》，大阪：杏雨書屋藏嘉永二年（1849）思位軒藏本。

- 桑田立齋，《牛痘發蒙》(1849)，大阪：杏雨書屋藏驅痘館藏本。
- 春堂牧，《引痘新法全書》，大阪：杏雨書屋藏弘化三年（1846）出版，九畹室藏梓。
- 廣瀨元恭校，《新訂牛痘奇法》，大阪：杏雨書屋藏嘉永二年（1849）仲冬刻本，時習堂藏本。
- 丁若鏞（1762-1836）著，金誠鎮編，鄭寅普、安在鴻校，《與猶堂全書》，Cambridge, MA: Harvard-Yenching Library（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京城府：新朝鮮社，1939。
- 池錫永，《牛痘新說》，大阪：杏雨書屋藏李太王自序（1865）活字刊本。
- Benjamin Hobson（合信氏），*General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Kum-le-fau in Canton, From April 1848 to November 1849*. Canton: Press of S. Wells Williams, 1850.
-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 ed.,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May, 1833. Printed at Canton, 1834.
- William C. Hunter, 1882,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Reprint,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二・近人論著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

- 1984 《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毛德華

- 1997 《萬全生平著述考》，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王振忠

- 2002 《徽州社會文化史探微——新發現的16-20世紀民間檔案文書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田濤

- 1995 〈清末民初在華基督教醫療衛生事業及其專業化〉，《近代史研究》1995.5：169-185。

伊莎貝爾・莫賴斯

- 2007 〈種牛痘與澳門葡人〉，《廣東社會科學》2007.1：128-133。

朱萬章

- 2001 〈潘仕家族與嶺南刻帖〉，唐文雅主編，《廣州十三行滄桑》，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頁129-144。

余新忠

- 2003 〈清代江南種痘事業探論〉，《清史研究》2003.2：28-37。

李少明

- 1999 〈建國前福建基督教的社會活動〉，《南平師專學報》1999.3：64-68。

林子昇

- 1998 《十六至十八世紀澳門與中國之關係》，澳門：澳門基金會。

邱仲麟

- 2006 〈明清的人痘法——地域流佈、知識傳播與疫苗生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7.3：451-516。

范行準

- 1953 《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夏鼎

- 1950 〈西洋種痘法初傳中國補考〉，《科學》32.11：343-344。

馬士著，區宗華譯，林樹惠校

- 1926 《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第1冊第1-2卷，第2冊第3卷，第3冊第4-5卷。

馬伯英、高晞、洪中立

- 1993 《中外醫學文化交流史——中外醫學跨文化傳通》，上海：文匯出版社。

勒費窩 (Edward Le Fevour) 著，陳曾年、樂嘉書譯

- 1970 《怡和洋行：1842-1895年在華活動概述》，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

張大慶

- 2002 〈《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考〉，《中國科技史料》23.3：209-213。

張嘉鳳

- 1998 〈生化之源與立命之門——金元明醫學中的命門試探〉，《新史學》9.3：1-48。

- 2003 〈鬼子之法——牛痘在十九世紀中國〉，發表於「明清至近代漢人社會的衛生觀念、組織與實踐」研究計畫討論會，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研究所，2003年4月7日。

梁其姿

- 1987 〈明清預防天花措施之演變〉，《國史釋論》，臺北：食貨出版社，上冊，頁239-253。

- 1999 〈中國癩瘋病概念演變的歷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0.2：399-438。

張嘉鳳

梁嘉彬

1937 《廣東十三行考》，臺中：東海大學，1960。

陳元朋

2005 《舉箸常如服藥——本草史與飲食史視野下的「食藥如一」變遷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陳邦賢

1937 《中國醫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陳垣

1908-1909 〈牛痘入中國考略〉，氏著，《陳垣早年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頁217-224。

1925 《二十史朔閏表》，氏著，《陳援菴先生全集》，臺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93，第14冊。

陳國棟

2001 〈潘有度（潘啓官二世）——一位成功的洋行商人〉，唐文雅主編，《廣州十三行滄桑》，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頁150-193。

彭澤益

1950 〈西洋種痘法初傳中國考〉，《科學》32.7：203-208。

1991 〈廣州洋貨十三行行商倡導對外洋牛痘法及荷蘭豆的引進與傳播〉，《九州學刊》4.1：73-84。

賀璋蓉

2001 〈十九世紀初至二十世紀初基督新教在廣州之發展〉，《世界宗教史研究》2001.2：105-113。

黃啓臣

1999 〈人痘的西傳與牛痘的東漸〉，《海交史研究》1999.1：34-40。

黃啓臣、龐新平

2001 《明清廣東商人》，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

楊家茂

1990 〈牛痘初傳我國史略及其意義〉，《中華醫史雜誌》20.2：83-85。

楊國楨

1996 〈洋商與大班——廣東十三行文書初探〉，《近代史研究》1996.3：1-24。

董少新

2002 〈十九世紀前期西醫在廣州口岸的傳播〉，《海交史研究》2002.2：21-29。

- 2007 〈論邱熺與牛痘在華之傳播〉，《廣東社會科學》2007.1：134-140。
- 廖育群
- 1988 〈牛痘法在近代中國的傳播〉，《中國科技史料》9.2：36-44。
- 1991 《岐黃醫道》，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 趙洪鈞
- 1989 《近代中西醫論爭史》，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
- 蔣竹山
- 1995 〈明清華南地區有關麻瘋病的民間療法〉，《大陸雜誌》90.4：38-48。
- 鄭澤清
- 2003 〈昨天的抗爭——近代上海防疫掠影〉，《上海檔案》2003.4：50-53。
- 薛清泉主編
- 1991 《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
- 山崎哲郎
- 1994 〈《啖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について〉，《日本の洋學論集》，東京：清文堂，第2集，頁203-220。
- Arnold, David
- 1993 *Colonizing the Body: State Medicine and Epidemic Disease in Nineteenth-Century India*.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iagioli, Mario and Peter Galison, eds.
- 2003 *Scientific Authorship: Credi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Scienc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Chang, Chia-Feng (張嘉鳳)
- 1996 “Aspects of Smallpox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Histor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London.
- 2000 “Dispersing the Foetal Toxin of the Body—Conceptions of Smallpox Aetiology in Pre-modern China.” In *Contagion: Perspectives from Pre-modern Societies*, edited by Lawrence Conrad and Dominik Wujastyk.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pp. 23-38.
- 2005 “When the Patient Becomes A Doctor: A Case Study on the *Zhegong Manlu* (*Random Notes on Broken Limb*, 1635).” Paper presented in the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Medicine, and Technology in East Asia, Deutsches Museum, Munich.

Clery, E. J., C. Franklin, and P. Garside

2002 *Authorship, Commerce and the Public: Scenes of Writing, 1750-1850*.
London: Palgrave Macmillian.

Dong, Shaoxin (董少新)

2006 “Qiu Xi and Yin dou ti yong.” Paper presented in the conference of
“Celebrating 200 Years of Smallpox Vaccines in Macau.” The Macau
Inter-University Institute, January, 2006.

Leung, Angela Ki Che (梁其姿)

1996 “‘Variolation’ and Vacc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 1570-
1911.” In *Vaccinia, Vaccination and Vaccinology: Jenner, Pasteur and
Their Successors*, edited by S. Plotkin and B. Fantini. Paris: Elsevier,
pp. 65-71.

Miller, Genevieve, ed.

1983 *Letters of Edward Jenner and Other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Early
History of Vaccination*.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Teixeira, P. Manuel

1975 *A Medicina em Macau*. Vol. 2, *A Nasologia em Macau*.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Wong, Chimin and Lien-Teh Wu (王吉民、伍連德)

1932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Reprint, Taipei: 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 1985.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Cowpox Vaccination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hia-Feng Ch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By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three Chinese texts on cowpox vaccinati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the history of cowpox vaccination in early 19th century China. Examination of these three texts provides compelling historical insight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introduction, promotion, accept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this Western technique.

The first vaccination text analyzed in this article is the one entitled *Yingjiliguò Xīnchū Zhōngdōu Qīshū* (The Extraordinary History of a New Method of Inoculation Discovered in the Kingdom of England, 1805), written by Dr. Alexander Pearson and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in 1805. This work was published with the help of Zheng Chongqian, a merchant who conducted foreign trade in Guangdong. The second text analyzed in this paper is *Xiyang Zhōngdōu Lùn* (On the Western Cowpox Vaccination, 1815), written by Huang Anhuai in 1815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cowpox vaccination. This was the first Chinese text to appl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theory to accommodate this Western technique. Two years later, Qiu Xi, who was a businessman in Macau and an apprentice of Alexander Pearson, published the *Yīndōu Lue* (Introduction to the Extraction of the Cowpox Vaccine, 1817) which became the most popular vaccination text throughout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publication quantity and geographic areas of circulation of these texts not only reflected their individual popularity, but also showed different degrees of attention and acceptance of these texts by their readers. The authors of these three texts engaged in different writing strategies to introduce and advocate the cowpox vaccination technique, but all three played an indisputably vital role in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vaccination technique in 19th century China.

Huang Anhuai and Qiu Xi applied traditional medical doctrines to incorporate the English cowpox vaccination into the Chinese socio-cultural context. Their approach represented some typical Chinese views on this Western medical practice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By examining the subtle differences between how these Chinese authors understood, introduced and localized this vaccination technique, we can gain insight into the diverse array of though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Western medical technique and the Chinese medical tradition.

Keywords: *Yingjiliguo Xinchu Zhongdou Qishu, Xiyang Zhongdou Lun, Yindou Lue, vaccination, Alexander Pearson*